

友好活动

- 李克强总理和莫迪总理共同出席中印地方合作论坛 张 敏 2
一树石榴花 温暖两座城 赵政绪 28
铭记历史、增进友谊、面向未来 刘莉莎 30
土耳其太空营地组织代表团访华 艾 林 31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 美国飞虎队桂林遗址公园开园仪式举行 李桑华 巴翠翠 靳航航 4
飞虎队员获救记 徐年瑞 5
我的飞虎情缘 江英山 6
往日并肩抗敌 今朝共促发展 郑 辰 8
与子同袍——中俄两国艺术家共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姚友超 10
我的母亲朱敏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难忘经历 刘 建 12
从一份七十年前的报道说起 理查德·傅莱(小)(德国) 15
晋察冀边区的医学医疗现状 理查德·傅莱(奥地利) 16
中日合作修复南京城墙 20 周年纪念活动在南京举行 沈海婷 21
歌声唱颂胜利与和平 川 友 23

在国外

- 李小林会长出席第十届济州论坛 卿伯明 24
中非友协代表团访问塞舌尔和津巴布韦 黄笑薇 25
摩洛哥之行 艾 林 27

文化交流

- 舞剧《朱鹮》访日巡演 马玉华 32
朱鹮的童话 顾子欣 33
当代以色列代表作家介绍 宫 旭 37

友好佳话

- 溥仪与国际友人谈从皇帝到公民的蜕变 汤铭新 40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拳拳爱心献中华——怀念老友爱泼斯坦 陈一心 43
忆金宗蔚 顾子欣 50

域外撷英

- 拜谒马克思故居 姜永良 52

封面：由全国友协、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15 天津国际少年儿童文化艺术节在天津举行（7 月 26 日）

主管、主办：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主 编：王 红
地 址：中国北京台基厂大街 1 号
邮 编：100740
传 真：010-65122782
印 刷：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国内统一刊号：CN11-1233/D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3-5303

网 址：www.cpaffc.org.cn
电子邮箱：yousheng_ys@sina.com

本刊数字版合作：龙源期刊网、中国知网。

本刊被龙源期刊网、中国知网收录，并进行数字发行。
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稿件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声明。

李克强总理和莫迪总理共同出席 中印地方合作论坛

张敏

2015年5月15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举办了首届中印地方合作论坛。国家总理李克强与在华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共同出席论坛并发表讲话。

李克强总理对中印地方合作论坛成立表示祝贺。李克强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充分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本次论坛以“智慧城市，智慧生活”为主题非常好，中印两国是两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通过两国地方层面的交流与合作，可以充分调动两国人民的智慧，使两国人民最终过上智慧生



李克强总理在论坛上致辞

活。中印地方合作论坛的举办具有历史性意义，是两国地方务实合作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将在中印两

国间激发巨大的活力和潜力。

莫迪总理表示，中印地方交流合作机制协议是印度政府第一次和



其他国家签署的地方层面的合作协议，是两国关系中有特殊意义的大事。印方十分重视此次论坛，愿借此论坛与中方省市共同探讨、创造新的地方交流合作机会，将中印地方交流及中印两国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

来自国内 2 个直辖市、4 个省、4 个城市及印方 2 个邦、4 个城市共约 180 人出席此次论坛。中印代表围绕“智慧城市，智慧生活”这一主题，就地方在促进中印建立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中的作用、可持续城镇化两个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其间，我会与印度外交部签署了《关于建立中印地方合作论坛的谅解备忘录》，将两国地方交流机制化。四川省和卡纳塔卡邦、重庆市和金奈市、青岛市和海德拉巴市以及敦煌市和奥兰加巴德市签署了第三批中印友好省邦/城市协议。

全国友协会会长李小林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在中印友好城市关系稳步发展，地方政府务实合作不断涌现的

背景下，中印地方合作论坛的举行可谓恰逢其时，将两国地方间的交流合作提升到新的高度。我会一如既往地加强与印地方加强沟通联系，为中印地方交流拓领域、搭平台，携手推动两国省邦及城市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帕特尔在讲话中强调，中印地方合作论坛的举办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中印地方交流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印各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愿与中方各省市加强联系，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

北京市市长王安顺、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山东省省长郭树清、广



莫迪总理在论坛上发表讲话

东省省长朱小丹、四川省常务副省长王宁、甘肃省副省长夏红民、青岛市市长张新起、成都市副市长刘守成、昆明市副市长杨珺、敦煌市市长贾泰斌及印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帕特尔、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长法德维纳斯、艾哈迈达巴德市市长梅纳西本、金奈市市长赛戴、新德里市代市长帕尔、海德拉巴市市政官戈帕尔等出席论坛并发言。■



美国飞虎队桂林遗址公园 开园仪式举行

李桑华 巴翠翠 靳航航

2015年3月28日，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广西桂林市出席并启动美国飞虎队桂林遗址公园开园仪式。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国务院副秘书长江小涓、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国家民委副主任陈改户、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谭天星、外交部部长助理郑泽光、全国友协副会长谢元、桂林市委书记赵乐秦、市长周家斌、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怀特黑德少将、荣誉主席方李邦琴、美国驻广州



刘延东副总理参观遗址公园展馆

总领事郭瑾、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史文强上校、91岁飞虎队队员杰·温

雅德、陈纳德女儿陈美丽、外孙女嘉兰德等 300 余名中美嘉宾出席活动。

全国友协副会长谢元与飞虎队老兵杰·温雅德



刘延东副总理在仪式开始前会见了美方代表团主要成员。刘副总理说，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中美两国在二战中作为盟友并肩战斗，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飞虎队等援华人员的英雄事迹将与日月同辉，永垂不朽。她强调指出，现今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但我们仍面对很多共同挑战，中美两国合作共赢不仅造福两国人民，而且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谢元副会长在仪式上致辞时说，美国飞虎队桂林遗址公园落成开园是对中美两国人民在二战中真诚合作、不畏强暴、追求正义与和平的那段历史最好的纪念与献礼。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包括美国在内的世

飞虎队员获救记

徐年瑞

界各国人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的宝贵贡献。我们将共同努力，继续发扬中美合作的精神，为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出贡献。

怀特黑德在致辞中说，美国飞虎队桂林遗址公园将永远代表中美两国在二战中合作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两国关系发展至关重要。中国人民从未忘却过飞虎队员所付出的牺牲，美国飞虎队队员也将永久铭记中国人民所作的贡献。感谢中方各级政府9年来对该项目的大力支持，期待遗址公园让更多的中美两国人民了解并珍视这段历史和友谊。他引用了李小林会长关于“中国梦、幸福梦、和平梦”的演讲片段：“和平梦也是世界梦，超越文明的不同，携手共同努力，是我们实现梦想的唯一选择。”

仪式后，中美嘉宾参观了遗址公园。

美国飞虎队桂林遗址公园于2011年7月动工修建，座落在桂林秧塘机场原址上，保存有山洞指挥所、陈纳德将军观战石、飞机掩体等文物，是美国飞虎队在华唯一现存的指挥所遗址。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向遗址公园捐赠了“飞虎队”军服、勋章、老照片等300多件历史文物。■

1944年7月8日傍晚，江西省浮梁县峙滩乡龙波村一位老农挑柴回家，发现山道旁躺着一个穿军衣的人，他想起上午听到的一架飞机落在峙滩乡铁路旁爆炸烧毁的消息，认为是日本飞行员。于是轻轻摸到离那人不远的地方仔细观察，一看是装束、皮肤不像日本人。此时，那人警觉起来，掏出手枪，用英语问：“你是什么人？”老农听不懂，为避免发生误会，立即回村，告诉当小学校长的张仁远。张听后，猜想一定不是日本人，否则早就开枪了。“可能是美国盟友！”他请老农带路，急忙赶去，不见有人。张校长读过初级中学，懂得一点英语，立即用英语喊道：“朋友，我们是中国老百姓，请快出来！”唤了几次，那人在草丛中观察来人空着手、态度友好，才艰难地走出来，解开外衣，露出内衣上的中文和英文：“中国盟友，我们是帮助中国抗日的。”张仁远笑着上前和他握手，搀扶着他回家。

到家天已墨黑，张校长忙着安排食宿后，立即找村里懂草药治疗外伤的人来检查伤口。这位飞行员记起在山上曾问过张：这里是不是国统区？（国民政府管辖区，日军占领地方叫沦陷区）当时张校长听不懂没有回答，故心中尚存疑虑，只肯吃带壳的食物，如鸡蛋、花生，也不肯上床睡。张校长见语言障碍很难进一步沟通感情，又扶他慢慢走了2公里，到附近一个叫流口的大村，找到读过大学的绅士张佩贤。双方用英语交谈，加上做手势，

才知道这个飞行员叫柯林，上尉军衔，他对日本侵略者偷袭珍珠港、南京大屠杀等暴行非常愤慨，1941年自愿参加陈纳德将军的美国援华十四航空队，曾参加对日空战百余次。今天早上驾驶飞机轰炸日本本土，完成任务后，不幸飞机受伤，坚持飞行了一段时间机件失灵，跳伞落在群山之中。他忍着饥饿，翻山越坡，多次被荆棘绊倒被尖石刺伤，行走十分困难，幸得张先生等人相救，十分感谢。并要求将他的情况报告政府，迅速与航空队联系。张仁远、张佩贤听后连忙说：“上尉先生，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我们抗日，是我们的好朋友，这点小事，是我们应该做的，不必言谢。”并连夜派人到乡政府所在地——峙滩去请医生。

第三天，浮梁县县长亲自到峙滩乡，迎接柯林上尉到景德镇。在县长亲自主持的欢迎座谈会上，柯林上尉十分感谢浮梁县政府和景德镇人民的无私救援。表示归队后，更积极驾机轰炸日本侵略军的军事设施，同中国军民一道，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8月1日，两架迎接柯林上尉归队的轻型飞机，降落在景德镇西瓜洲河滩上。景德镇成千上万市民闻讯赶到飞机降落的地方，热烈欢送美国盟友，欢送反法西斯的战斗英雄。

注：当时，景德镇属浮梁县管辖，县政府设在景德镇。当时景德镇交通工具主要是木船，没有汽车站、没有机场。

我的飞虎情缘

江英山

“我一直和中国人民有着难舍难离的感情……任何东西都无法回报他们的救命之恩。”飞虎队员格伦·本尼达曾无数次地对家人这么说。

在全国友协工作十余年，我逐渐对飞虎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小时候就经常听到“飞虎队”的名字，但也只知道那是陈纳德将军领导的作战部队而已。应该说，我的飞虎情缘始于 2002 年 10 月。当时，刚加入友协不到三个月的我，接待了陈纳德将军的女儿罗斯玛丽·西姆拉尔和外孙女嘉兰慧。虽然我们只相处了短短的五天时间，罗斯玛丽那像极了陈纳德将军的眼神和下巴以及嘉兰慧亲切的美国南方口音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我和嘉兰慧偶尔会互通电子邮件，MSN 对话，甚至是打越洋电话。这种不间断的联系，不仅增加了我对飞虎队和陈纳德将军的了解，也加深了我和这个与中国有着深厚渊源的美国家庭的感情。

2005 年 8 月底 9 月初，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受中国政府委托，邀请美国二战援华老兵及其亲属共 110 多人访华，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纪念活动”，其中就包括罗斯玛丽一家。在北京参观故宫的时候，已经 77 岁的罗斯玛丽因腿脚不便需要乘坐轮椅。我一遍遍地正着推她



刘延东副总理在展览开幕式上致辞

上坡，倒着下坡，在平路时还偶尔和她来段轮椅舞，感情就像一家人一样。在接下来的旅途中，她逢人便介绍说我是她的“中国孙子”，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第一次有了一位“美国奶奶”。

那次应邀参加 60 周年纪念活动的 110 多人中，还有一位叫格伦·本尼达的飞虎队老兵。1944 年 5 月 6 日，年仅 19 岁的本尼达驾驶的 P-51 战机被日军击中，落在了湖北监利县附近的湖中。被迫跳伞的本尼达在当地农民的冒死相救下，被成功护送到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的部队。在经历了 60 天的艰难险阻后，本尼达安全返回了美军基地，并与李先

念结下了深厚友谊。

60 年后的访问中，本尼达首次见到了李先念的女儿、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李小林，并在重返湖北监利时见到了许多当年营救过他的中国农民及其后代。成百上千的老百姓从各地赶来，想看看这位当年援华抗战的美国老兵。近 60 年后，当本尼达与救命恩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时候，两人都激动落泪，场面既温馨又感人。60 年后的情缘再续，60 年后的动人场景，使李会长萌生了拍摄一部讲述本尼达感人故事和中美二战合作历史纪录片的念头，这就成就了后来友协民间外交的又一亮点——《飞虎情缘》。

2010 年 10 月，为了完成《飞虎情缘》的拍摄，再一次看望那些救助过自己的中国老朋友，做了 9 次心脏搭桥手术的本尼达带着家人再次来到了中国。我陪同本尼达一家 11 人访问了北京、湖北和上海。考虑到本尼达的身体状况，我们特意邀请了北京医院的大夫全程陪同，并只安排本尼达及夫人参观较近的新四军五师师部旧址大悟县，而没有前往路途更远的监利县。那次访问后，老人家在回国后第三天与世长辞。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晰记得近 5 年前的那个周末，自己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未知来电号码，想接却又不敢接。打来电话的是本尼达的大儿子爱德华，他告诉我老人

走了的消息，并安慰我说，他父亲的离世是自然的生老病死，而不是因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的旅途劳累。本尼达和家人也曾多次说过，他的生命是中国人民给予的，没有当年中国军民的冒死相救，也不会有他后来 60 多年的幸福生活和美满家庭。

2011 年 5 月，依照本尼达的遗愿，他的遗孀埃莉诺和两个儿子回到了中国，并将这位飞虎队老兵的部分骨灰安放在了湖北红安李先念故居纪念馆。在骨灰安放仪式上，我第一次在众多中外来宾面前高声唱出了中美两国国歌，作为送给本尼达的临别礼物。仪式后，埃莉诺走到我身边，热泪盈眶地握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就这样，我又多了一位“美国奶奶”。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 2015 年，全国友协于 6 月 24 日在美国华盛顿举办“为了正义与和平——中美二战合作图片展”。图片展共选取了 94 幅照片，通过“中美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英雄”、“中美军民情”和“向友谊致敬”四个部分，生动再现了中美军民并肩抗敌，结下深厚情谊的珍贵历史。在美主持第六轮中美人文高层磋商的刘延东副总理在出席图片展招待会时说，历史不会忘记，70 多年前，一大批风华正茂、富有激情和正义感的美国青年飞行员来到中国，和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一起，用血肉筑起一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新的长城。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约有 25 万中国军民参与了各类营救美

军士兵的行动，数万人在行动中牺牲。而参与援华抗战的美国空军将士约 18000 名，其中 2193 名飞虎队员牺牲，200 多人在中国军民的救助下死里逃生。参观图片展的美国援华老兵一致建议，应该让更多的美国人看到图片展，让他们了解这段不被其所熟知的中美二战合作史。

看着图片展的一幅幅照片，回想着《飞虎情缘》的一个个镜头，回味着陪同罗斯玛丽和本尼达的点点滴滴，我感慨良多。虽然，两位老人都已离开了人世，但他们的笑容、他们的眼神、他们的中国情结，却依然深深地触动着我。我很庆幸自己选择了民间外交这条道路，因为这条路上有许多类似的人民情谊和感人故事。当年，为了正义与和平的信念，一群 20 来岁的美国青年毅然决然地来到了这个他们知之甚少的远东国度，与中国人民一起抗击法西斯侵略。今天，正是为国交友的信



陈纳德女儿罗斯玛丽和本尼达在抗战胜利 60 周年招待会上

念，正是对飞虎队的崇高敬意，也正是与陈纳德家族和本尼达家族的深厚情谊，坚定了我继续做好民间外交工作的信念，坚持为这份友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文作者参加图片展布展工作



往日并肩抗敌 今朝共促发展

——记全国政协副主席、中俄友协会长陈元访俄出席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系列活动

郑辰

70 年前，一场战争让世界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约 20 亿人口卷入其中，战火所及之处民不聊生，人类文明遭受空前浩劫。在这场正义与邪恶的殊死搏斗中，包括中苏两国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同仇敌忾，并肩战斗，才使得最终光明照亮了黑暗，进步战胜了反动。

中苏两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也都付出了世所公认的民族牺牲。英勇的苏联军民在欧洲主战场上，不顾条件恶劣，凭借满腔热血一路攻克柏林，将丧心病狂的侵略者交由历史审判，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战争史上的传奇神话；作为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不屈不挠的中国军民同日本军国主义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千千万万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壮美诗篇。

70 年后，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达成隆重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共识，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也为进一步推动中俄战略协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根据两国元首共识，今年中俄友协举办一系列活动。5 月上旬，全国政协副主席、中俄友协会长陈元对俄罗斯进行友好访问，这也是陈元副主席去年担任中俄友协会长以来第二次访俄。



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70 周年红场阅兵式

5 月 5 日上午，中俄友协与俄中友协在俄科学院大楼联合举办题为“回顾历史 展望未来 珍爱和平”的纪念大会，陈元会长出席大会并致辞，与俄外交部副部长莫尔古洛夫分别宣读了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致大会的贺信。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表示，70 年后的今天，我们共同纪念这一伟大胜利，缅怀为了捍卫正义、光明、自由而英勇捐躯的中俄两国先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俄罗斯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牢记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开创持久和平的明天。希望这次纪念大会能巩固中俄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传统友谊，推动中俄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携起手来，共同开创两国发展振兴和人类和平进步更加美好的未来。

普京总统在贺信中提到，俄罗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英勇顽强的中

国兄弟们为取得共同的胜利献出宝贵生命，中国人民也同样永远铭记在援华抗日过程中牺牲的苏军将士。我们决不接受篡改历史的图谋和美化纳粹及其帮凶的无耻行径，这样的行为不仅是不道德的，更是极度危险的，它们直接导致世界走向冲突和暴力。本次纪念大会定有助于世人正视历史、缅怀先烈，并培养青年人的爱国主义和人文主义情怀，增进人民友谊。

中国驻俄大使李辉、全国政协副主席谢元、俄外交部副部长莫尔古洛夫及中俄两国专家、学者和老战士代表分别发言，共同回顾中苏两国军民并肩抗敌的光辉历史，一致强调和平与稳定对于人类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意义，表达将携手努力共促发展的美好愿望，那份发自内心的真诚让在场每个人都为之动容。

红场阅兵是俄罗斯每年 5 月 9 日“胜利日”都要进行的活动，已成为一项光辉传统，当年苏军战士们正是在此接受斯大林等苏联党政领导人检阅之后，在亲人们的祝福中直接奔赴西部前线，一举扭转颓势，转入反攻。今年为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更为盛大隆重，规模空前。包括习近平主席在内的 20 余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出席，我国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和来自印度、蒙古、独联体等国家的方阵一并接受检阅。陈元会长也受邀作为贵宾出席观礼，体现了俄方对陈元会长本人的敬重，对其多年为推动中俄务实合作所作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俄友协会长陈元在纪念大会上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积极贡献的充分肯定，以及对于中俄民间友好事业的高度重视。

陈元会长观礼后表示，十分有幸见证这一重要历史时刻，此次习近平主席出席观礼得到高规格安排，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在所有外国军队方阵中“压轴”出场，且人数占有绝对优势，均体现了中俄两国间不同寻常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高度的政治、军事互信。中方支持俄方举办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70 周年庆祝活动举世瞩目，也将为进

一步提升两国合作水平注入新的活力。

陈元会长此访从民间角度向俄方传递了和平友好的信号，夯实了两国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同时烘托了习近平主席访俄的热烈气氛。无论是纪念大会，还是红场阅兵，我们接触到历经战争年代的老战士，也看到向老战士自发致以敬意的少年儿童，从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能体会到他们对于今天和平生活的感恩与欣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翻开泛黄的历史，是为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昔日并肩作战的中俄两国唯有携起手来，同护和平、共促发展，才能不负先烈们的奉献与牺牲，也才能真正体现《联合国宪章》中“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宗旨，早日实现“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的美好愿景。■

“回顾历史 展望未来 珍爱和平”纪念大会现场



与子同袍

——中俄两国艺术家共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姚友超

5月26日，由中国俄罗斯友好协会主办、中国煤矿文工团和俄罗斯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联袂推出的大型情境歌舞剧《胜利 1945——守望》在莫斯科隆重首演。

70年前，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和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同时获得了胜利。很多华夏儿女在苏联卫国战争的战场上浴血奋战，也有大量苏联友人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贡献力量和生命。在两国获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对他们的纪念不但彰显两国传统友谊，对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是强力的推动。2014年初，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出席索契冬奥会时表示，他和普京总统已经决定，2015年双方共同

喜庆的婚礼



谭忠惠为俄罗斯援华作战中英勇牺牲的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烈士守墓

举办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活动。

为落实两国元首的决定，进一步推动中俄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加强两国之间文化艺术交流，中国俄罗斯友好协会决定举办“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专题文艺演出”。

剧目以“守望家园，守望和平，守望英雄，守望崇高”为主题，讲述援华助战、血洒长空的前苏联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英勇牺牲，中国女工谭忠惠母子两代忠诚守护陵墓半个多世纪的感人故事，展现出一幅中俄两国人民相互支援、并肩

战斗、反击侵略者的壮美画卷。

中俄艺术家用红色经典抒发时代感怀，选取的都是历久弥新的经典，既有大气磅礴的历史叙事，更有荡气回肠的英雄传奇。演出以一场喜庆的婚礼开场，但因为日本侵略者飞机轰炸，山河破、人离散，引出了第一个情境歌舞，年轻的舞者以巨大的张力，表现了百姓被迫背井离乡，逃亡关外的凄惨境遇。中国煤矿文工团副团长牟炫甫一曲《松花江上》更是将观众带回到那个悲惨的年代。舞蹈演员呼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的时候，情感喷涌而出，整首旋律高潮的到来水到渠成。此曲深深折服了全场观众。

演出中两国艺术家还以全新的方式共同表演了《神圣的战争》。这首为两国人民耳熟能详的苏联的卫国歌曲，最能纪念二战的历史。1941年6月下旬，德国对苏联发动了闪电战，苏联军队奋起反抗，频频受挫，伤亡惨重，数以万计的大小城乡毁灭在德军的炮火下，上百大中城市沦陷。危难时刻，为了鼓舞军队和人民的顽强斗志，红旗歌舞团的亚历山大罗夫连夜谱写出这首歌曲，旨在鼓舞苏联人民的斗志。歌曲很快响彻苏联的每个角落，苏联士兵用钢铁般的身躯阻挡住德国军队的前进步伐，由防御转为反攻，直至胜利。在本次的演出中，两国艺术家作了大胆的创新：红旗歌舞团组成合唱方阵，煤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利用多媒体技术，从红场的纪念碑的浮雕上幻化成苏军战士，高举战旗以简洁、淋漓的肢体语言诠释了战争的残酷、正义的胜利，并最终将红旗插上了柏林的帝国大厦。

舞台上大量使用多媒体技术，让珍贵的历史影像与舞台虚拟情景不断交融互动，音乐、舞蹈、曲艺、话剧、朗诵、杂技、沙画、器乐演奏等多种艺术表演形式巧妙揉合，呈现出气势恢宏、色彩绚烂、刚柔兼备、荡气回肠的舞台艺术效果。

5月26日晚，将近两千座位的俄罗斯陆军模范剧院内座无虚席，全场观众反响热烈，掌声如潮，许多人流下了感动的热泪。演出结束后，很多俄罗斯观众久久不肯离去。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观看演出后，给予了高度评介，指出演出



奋战在抗日前线

恰是中俄友好和俄中友好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通过歌舞剧艺术形式展现出中俄两国人民相互支援、并肩抗击侵略者的壮美画卷，体现出两国人民、两国军民团结御敌并取得伟大胜利的主题，以及中俄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和军民鱼水情。■

庆祝胜利



我的母亲朱敏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难忘经历

刘 建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70 多年前，中苏两国的军队和人民并肩战斗，浴血奋战，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也建立了深厚友谊。下面，我根据母亲朱敏所述，回顾一下她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难忘经历以及她与俄罗斯这个美丽国度所结下的不解情缘。

俄罗斯是母亲的第二故乡。母亲求学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前苏联度过的，他的一生受俄罗斯的文化熏陶和影响很大。1926 年，爷爷朱德在苏联学习军事，母亲出生了，不久爷爷根据党的指示返回祖国参加著名的南昌起义，我母亲被姨妈从中苏边境的满洲里带回成都抚养。

1940 年 10 月，母亲被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护送到延安，与爷爷团聚。一天，爷爷把母亲叫到跟前，郑重地说：

“现在国内正打仗，打完仗就需要建设，就需要人才。你去苏联学习吧，爹爹等着你回来建设新中国。”爷爷拉着母亲的手说：“你以后不要叫朱敏，叫赤英，意思是红色英雄，赤又通朱。”毛主席得知母亲要去苏联学习，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并在母亲的笔记本上挥笔写下了“努力学习”四个大字，以示对她的期望和激励。1941 年初春，14 岁的母亲和毛主席的女儿李敏一起来到了



朱敏与父亲朱德登山小憩

苏联这片她出生时的热土。

到达苏联后，母亲被分配在距离莫斯科 300 公里的伊万诺沃国际第一儿童院，这是苏联最大的国际儿童院，集中了 40 多个国家的孩子。母亲一到儿童院，便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比起父辈们正在奋斗的国内根据地，这里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很好，完全成了孩子们童话中所描绘的天堂。直到苏德战争爆发，大家才深刻体会到战争是什么。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母亲在德国纳粹的集中营里经受了苦难，也

收获了坚强。由于气候的变化，母亲的哮喘病复发，儿童院将她送到白俄罗斯境内的疗养院治疗。刚到不久，德国法西斯就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疗养院被法西斯分子占领，母亲和其他小伙伴被押送到德国设在东普鲁士境内的集中营。进入集中营前，每个人都要换掉身上所有的衣服，穿上囚服，交出所有携带的物品，进行所谓的“洗澡消毒”。当看见德国兵拿走了父亲送给她的派克钢笔后，母亲冒险把一枚在国际儿童院得到的列宁徽章含进嘴里，

躲过了德军的严格检查。那时，母亲和其他儿童院的中国孩子们都热爱十月革命、崇拜列宁，徽章对她来说就是精神支柱。这枚徽章和她盼望与父亲相聚的强烈愿望，伴随着母亲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光，一次次给了母亲活下来的勇气。后来，这枚徽章，伴随着母亲度过了4年的监禁，陪伴母亲走过了一生，并珍藏至今。

在集中营里，母亲吃发霉的黑面包，和其他小囚徒一起做苦役，还时不时挨打。目睹了法西斯屠杀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她的心一次次被人间惨景所强烈震撼，内心也充满了对法西斯的仇恨。听说，子弹受潮会变成哑弹，母亲和几个女孩子就开始商量如何才能把子弹弄湿，因为不能带水进工棚，不可能往子弹上洒水。最后她们决定趁监工不注意时往子弹盒里吐口水。后来前线退回来好多子弹，以为是制造车间的质量问题，谁也没想到会是这些小囚徒的口水作祟。

在集中营里，母亲保护自己的最重要方式，便是对自己的真实身份绝对保密。此时，远在延安的父亲正在全力指挥着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在漫长的两年多时间里，女儿却毫无音信、不知行踪。长时间的等待，使父亲对这位唯一的爱女越来越不放心，终于在1943年10月忍不住给女儿写了一封信：

朱敏女儿：

我们身体都很好，朱琦已在做事，高浩还在科学院，兹送来今年上半年相片两张。你在战争中应当一

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同体力都要同时并练为好，中日战争要比苏德战争更为迟些结束。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回来做些建国事业为是。

朱德 康克清

1943年10月28日于延安

这封简短的家信，饱含着爷爷和奶奶对爱女的牵挂和思念之情。可是这封信最后以“邮路中断，无法投递”的理由退回到延安。此时，爷爷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他很想知道女儿的下落和在苏联的情况。可是，当他一想到斯大林的儿子在卫国战争战场上被俘，法西斯把他当人质向斯大林讨价还价，以此换取他们被俘的高级将领，被斯大林拒绝后，法西斯竟然残忍地将他杀害时，爷爷断然决定：不能为了自己的私事，打扰战争中的苏联政府。从此，他再不提寻找女儿的事，这封信也被奶奶收藏起来，至今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1995年，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当时俄罗斯政府向当年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和在卫国战争期间作出贡献的各国友人颁发了由叶利钦总统亲笔签名的功勋纪念章，以奖励那些在二战时期作出贡献的英雄们。中国有18人被授予纪念奖章，其中有一枚授予了我的母亲朱敏。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亲笔签名并委托驻华大使颁发给母亲一枚功勋纪念



朱敏（中）与小伙伴们在德国集中营

章，以表彰她在卫国战争中，不畏强暴，严守身世，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与法西斯作斗争，顽强地在集中营活了下来，最终回到莫斯科的动人事迹。

母亲毕生致力于俄文教育工作中俄友好事业。卫国战争结束后，母亲决定继续留在前苏联求学。凭着坚强的毅力，母亲在国际儿童院补习俄文，不到一年就掌握了俄文。接着转到伊万诺沃学校补习完中学的课程。在集中营里，母亲跟着难友们学说俄语、捷克语、波兰语，还学着说德语，但中文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当她提笔给父亲写信时发现许多字都不会写，只好用俄文代替。母亲经常笑言，自己在与别人交谈时，有时竟然还会突然冒出俄文来，把自己都吓一跳。

动荡的生活，几经失学，使母亲深知求学的艰辛。特别是当她亲眼看到在卫国战争中失去父母流落街头的孤儿，想到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为苏联人民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卓越成绩，母亲便产生了当一名人民教师、献身教育事业的强烈愿望，她的选择也得到了父亲的支持。1949年，23岁的母亲考入列宁教育学院学习。1953年，母亲大学毕业回国后一直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刚开始，她教的是俄文新生班，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她又是新教员，没有教学经验，教学中遇到不少困难。可是母亲始终牢记父亲对她说过的话：“我们国家现在需要建设人才，你所从事的正是培养人才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你的期望。”母亲没有高干子女的架子，大家都愿意和她相处，热情的关心她、帮助她，很快母亲便能胜任

教学工作。母亲献身教育事业也曾多次受到毛主席的嘉许。1950年初，毛主席和周总理在苏联访问期间，将母亲接到他们下榻的斯大林别墅，向她了解学习和生活情况。面对毛主席关于将来如何打算的征询，母亲回答：“我愿意留下来，等学成后再回国。”母亲还谈到自己决心选择教育专业。毛主席当即表示：“当老师很好，只要你喜欢。当老师很有意思，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大批优秀教师的。”以后，毛主席还曾多次向母亲询问北京师范大学的工作、学生的学习和身体健康等情况，鼓励母亲为教育事业多作贡献。

1980年至1984年，母亲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工作。她在4年任职时间里，对苏联的教育作了深入的调研，写出了《苏联职业教育简况》、《苏联普通教育的几点情况》等多篇调查报告。她抓住了

苏联教育发展的重点，指出了苏联普通教育职业化和职业教育普通化的趋势，这个趋势在当时又恰恰是世界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在莫斯科期间，母亲主动协助对外宣传工作，把中国电影和资料片译成俄语向当地民众介绍，积极与侨居苏联的当年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人联系，热情介绍祖国的情况，建议他们回国看看，多为祖国建设出力。1986年，母亲离休，在俄文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了30多个春秋，培养了一大批俄文翻译人才。此外，母亲还担任了中俄友好协会理事，后来又多次到前苏联，为传播俄罗斯文化，促进中俄友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作者系朱德元帅的外孙、朱敏长子，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装备学院原副院长。

1974年，本文作者向朱德元帅汇报在部队当兵的体会



从一份七十年前的报道说起

理查德·傅莱（小）（德国）

这是一份我父亲在告别了他终生难忘的晋察冀抗日前线，来到延安工作的初期，为了给边区军民争取国际援助，写给美国援华委员会的报道。

在这份报道里，傅莱叙述了他从 1941 年底至 1944 年底，在抗日前线和在白求恩卫生学校里的一些医疗和教学的实际情况及亲身经历，从中反映出了边区军民严重缺医少药和卫生学校教材教具极其匮乏的状况。在报道中，他还同时记述了八路军将士英勇顽强的事迹，和侵华日军令人发指的凶残暴行。

一年多后，傅莱在晋察冀多次接受了来自国外援助的医药医疗器材、教学书籍和其它的物资。这些急需的物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晋察冀边区八年抗战后满目疮痍、一贫如洗的状况。

在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的日子，衷心感谢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友声》杂志主编王红女士，请章丽珍女士将傅莱这份英文报道翻译成中文并摘要刊登。我也愿借此与九泉之下的父亲，来共同纪念这个永世不忘的日子。

中国人民赢得这场战争已经整整 70 年了，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场中国为争取独立、自由和正义的战争，永远不会忘记这场持久残酷的战争，这场不仅给中国人民、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的



上世纪 70 年代初，作者与父亲在北京长城

战争。

遗憾的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日本政府都不能对这段侵略历史进行深刻的反省，尽管中国人民及亚洲各国对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较之战后欧洲国家对德国的惩治有了许多的宽容。中日两国的民众和学者，都应就当下日本政府对侵略史的态度问个为什么。

曾在纳粹时期迫害了傅莱家族三代人的德国，从二战结束至今，历届政府上台执政，首先把承担历史罪责、警示社会、防止重蹈覆辙，作为执政纲要明示民众。从 1970 年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著名的“华沙之跪”，到今日德国总统高克所讲：“不存在有着德国身份的人，而没有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罪恶的记

忆。对大屠杀的记忆是住在德国的所有公民的事情。”今天，尽管德国仍然存在一些仇视外民族的极右社会群体，和企图死灰复燃的新纳粹分子；但一当他们有何违宪举动，除了政府的干预外，顷刻间就有更多的民众和团体自发地组织起来，与之对抗。

同样在奥地利，为了纪念二战期间被纳粹迫害的人士，国家基金会今年将出版名为《记忆》的书集。我去年为纪念傅莱逝世 10 周年，在全国友协《友声》杂志发表的《缅怀父亲》一文和大量的历史照片，也将在该书全文刊登。奥地利总统海因茨·菲舍尔博士，还专门为此书撰写了一篇纪念和回忆傅莱的短文。

历史是发生了的事实，它不是你承认或不承认而永远存在的事实。只有承认事实，承认历史，才有和平，才有未来，才有世界人民的和平共处，才有邻国的和平共处，特别是，才有与曾经被你欺凌过的国家的后人的和平共处。

与崛起了的中国，建立一个和平互助共赢的正确新型邻国关系，是中日两国人民真正的心愿；而扩军结盟对抗，是政客一时的短见，是不可能有的出路。愿中日两国能永远保持世代友好的睦邻关系。

写于 2015 年 6 月 20 日

晋察冀边区的医学医疗现状

(节选)

理查德·傅莱 (奥地利)

我在最终离开敌占区之前，曾两次到过边区。1940年春，在河北的东部我呆了不长时间，在那儿帮助救治了一些伤员。1941年的夏天，我要去解放区工作，但当时日军正展开进攻，无法前往。直到1941年的12月，我才离开了敌占区。

离开北平后，我先到了八路军的平西司令部。在平西司令部，我大约呆了两个星期，然后去了晋察冀的八路军司令部。在那里，聂荣臻司令员希望我能去白求恩卫生学校教书。这所学校离前线25英里，在一个名叫葛公的大村子里。我在这所学校一共生活、工作了3年左右。我刚到学校时，学校里有教员、护士和工作人员近千名。国际和平医院也在这个村里。我到学校后，先熟悉了一下那儿的的情况；两周后安排我为高级班授课。

入学学生的学历要比西方学生的学历低，平均只有初中或小学水平。在高级班开课之前，他们已经学习和实践了3年，因此有可能教他们一些比较难的课程。一开始，我教课也很困难，因为当时我的中文还不好。我只能把所有要讲的内容先写下来，然后再把我不知道的单词翻译出来。结果，一个小时的课，我要花上8个小时的时间备课，而每周我有6节课。学校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的新书，学生们对有关医学方面的新发展知道得很少；他们



1942年傅莱在晋察冀白求恩卫生学校，用白求恩留下的打字机备课

根本不知道磺胺类药，对阿的平等药也知之甚少。因此，我在授课时，总是先介绍医学方面近来的发展。

当时，培养部队的医生和外科大夫，一般需要2年的课程学习时间，再加上半年的实习。另外，学校还开设了培养药剂师和配药师的课程，以及一年制护士培训课程。参加护士培训班学习的学生的学历要比医科学生的学历更低。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学生进行一些特殊的医学预科培训；给他们上生理学、组织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药理学以及化学、物理和数学课等。每门课程授课课时从50小时到150小时不等。学校除了常规的内科和外科教学外，还开设了有关眼、耳、鼻和喉科等疾病、以及皮肤病、性

病和妇产科的课程。只有高级班开设了儿科的课程。

由于学校的经费有限，学生和老师们连纸和墨水这样的基本用品都缺，书本就更加缺乏了。这使得学校开展工作非常困难。最新的书是1940年版的《医学评论》。大部分的书都是1935年或1936年出版的。由于没有现代医学杂志，我去延安后，就从最新的美国医学期刊中翻译了一些文章，寄给了学校。学校里倒是有一些基础医学的教材，但这些书如果丢失了，就再也无法补上了。因此，为了防止日寇的突然袭击，平时把这些书都藏了起来，只有在特别需要时才能拿出来。

新生刚入学时，没有任何的医学常识。但经过了2至3年的学习后，他们对所有主要课程的知识都能掌握得相当好。我们的教学，把重点放在有实际价值的课程上。比如，北方没有的疾病，这方面的知识就不教；而北方有的疾病，其相关的知识就教得非常详细和全面。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教授有关疟疾、伤寒、回归热和战伤外科学的知识上面。学生们毕业后，将被送到前线或者地区医院去，在那里的正式医生指导下，再实习6个月。

由于医疗器材和药品的匮乏，医疗工作的开展很受局限。在这里甚至连很简单的器材，如听诊器和温度计都十分稀缺，使得一些医生

只能训练自己在不用听诊器的情况下工作。每两个月，所有的医生都能拿到一本由边区医学咨询委员会出版的油印医学期刊。在期刊里登载了当前所出现的各种医疗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是由我们学校的老师所写的。

我刚到学校时，柯棣华大夫是学校的负责人。在他的管理下，一些训练得比较好的外科医生从学校毕业了。他对工作的态度、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理解以及对日寇的仇恨，给所有见到过他的人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幸的是，1942年12月他因癫痫发作离世，留下了他的妻子（前协和医院的护士）和一个幼儿。他的去世不仅对学校而且对整个八路军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他的工作很出色，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学校的教职员都是受过正规教育的内科或外科医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同时在国际和平医院里做实际医疗工作。尽管医院的医疗设备和人员在整个地区都是最好的，但是它的设备还是比任何人所预期的都要差。由白求恩大夫1938年带来的器械还在使用。实际上，这些是唯一可用的器械。大部分的药也都是当地生产的。

国际和平医院看上去不像医院，倒像是普通的农舍。医院分5个病房区：内科、外科、传染病科、产科和眼科病房。病人们都躺在炕上。医院里有一个实验室，3台显微镜（与学校合着用），其它的设施很少，试剂等也都缺乏。最近，我们几乎无法从敌占区那儿搞到新货。

医院里有一个手术室，一个牙科治疗室和一个门诊部。门诊部每天免费给大约100个病人治疗和发药。我们有一台X光机，但没有发电机；因此，只能去离医院最近的兵工厂使用它。尽管这样，机器通过断续器使用来自直流发电机的电，运转很不稳定。

这里大部分的内科病人患的都是疟疾、回归热、肠胃炎或肠道紊乱等疾病。外科虽能处理各种各样的创伤，但手术的种类和数量却受限于可供使用的医疗器械。棉花、纱布，甚至连医用的羊肠线都是当地生产的。

每年我都要到前线去巡查2至3个月。这样，我就有机会去看看那些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学生毕业后的工作情况。在前线，既没有实验室又没有X光机，甚至连听诊器和温度计都没有，只有非常优秀的大夫

才能在这种条件下工作。尽管有这么多的困难，我们的医生通常还是能够做到正确诊断。在前线的医生们都非常渴望学习，每次我去巡查时，都要花相当多的时间给他们授课和开讲座。

我们除了缺少医疗器械设备外，药品也非常匮乏。比如，在这里每年大部分的人都要患疟疾病，而拥有1900万人口的边区，却只有30到50磅的奎宁。

在过去的2年里，我们一直都在试验用其他的方法来医治疟疾。我们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即使我们有足够的奎宁，但对疟疾的长期患者来说，只靠奎宁治疗也是不够的。同时我们还发现，用中国几百年前的古老方法来治疗疟疾，的确有疗效。因此我们采用针灸，治疗了相当多的疟疾病人。我们先消毒皮肤，然后用普通的针刺入选好的

1942年柯棣华病逝。左起：其妻郭庆兰、儿子印华、傅莱、殷希彭、陈淇园、江一真向柯棣华遗体告别





1942 年傅莱在抗战前线诊治患病的八路军战士

位置。通过针灸，我们防止了大多数疟疾患者的发作，省下了几百磅的奎宁。我们还把这个方法教给了当地的老百姓和战士。现在，一些农民都能够在大夫不在时，为他们的邻居治疗疟疾了。

我们在疟疾发作前的 2 至 3 小时之间进行针灸；将针在第七颈椎骨和第一胸椎骨之间、以及第六与第七胸椎骨之间，刺进 2 毫米深。针刺入皮肤后，按摩周围的皮肤并挤出一两滴血来。我们用显微镜观察了这个方法，发现经过针灸治疗后，患者血液中的寄生虫逐渐消失，起码百分之七十的病人血液中的寄生虫有所减少；同时血液中的白细胞也有所增加。这是针灸法，还有其他的中医方法，也都有些疗效。

这种刺激神经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促使我在这所学校以后的 2 年时间里，对类似的治疗方法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我的研究是基于斯佩兰斯基《医学基础理论》中所提出

的观点，常常发现一些无法用一般理论进行解释的惊人结果。比如，我在治疗一些胃溃疡患者时，采用注射奴佛卡因麻醉药，使腰交感神经阻滞。用这个方法还治好了一些吐了几年血的病人。大约 2 年后我离开这个学校时，他们的病都没有再复发。通过把奴佛卡因注射到肾周围的组织，我们完全治愈了 3 例雷诺氏病人。坏疽停止了扩散，这 3 个病人恢复了健

康，只是丧失了一些次要的功能。用这个方法还治好了 2 例变应性皮炎。

另一种方法就是抽脊髓液。将脊髓液抽出再注射进去，反复 10 至 20 次后最后抽出 10 至 12 毫升。用这个方法，有效地对 2 例癫痫病病人进行了治疗，不但防止了痉挛发作，还减轻了癫痫症状。癫痫发作一般持续 1 至 2 个小时，治疗后只持续了 5 到 10 分钟。用注射奴佛卡因，使用腰交感神经阻滞的方法治疗外科疾病，如腿部溃疡和下腹部感染，也都取得了一些成功。用这一方法治疗神经痛也有一定的功效。受前线条件所限，我们无法进行系统的研究工作。敌人在一年里要进行一两次大扫荡，因此我们常常再也见不到我们治疗过的病人。尽管采用神经刺激法治疗疾病也经历过失败，但是这种刺激疗法肯定是有前途的。我希望在延安能继续对此方法做更多的研究。

我们自己在晋察冀的药厂能够生产数量有限的药品，如小苏打、硫酸钠、硫酸镁等药，还能生产各种中草药。这使药物匮乏的情况能有所缓解。但我们无法生产任何磺胺类的药，也根本无法得到这类药。

在前线，由于缺乏诸如碘酒和红汞等这些普通的药物，以致伤员们的伤口常常发生感染。伤势重的伤员患了败血症，我们采用静脉注射利凡诺，以及红汞等进行治疗。由于缺少磺胺类药物，许多伤员牺牲了。因为缺少止血钳，在前线做手术很困难。一个团通常只有三四把止血钳，而且还常常是很旧和生锈的。我们无法在当地生产止血钳。有时候，我们只能用木匠的锯子和普通的刀来做截肢手术。我们只有用蒸馒头的蒸笼来消毒，因此无法达到彻底消毒。当地能够生产的器械只有剪刀、刀和解剖镊。由于我们没有 X 光机，许多骨折的病人不能康复，造成残疾比例很高。治疗骨折的唯一方法，是用托马斯夹板和熟石膏，直到最近才用了骨牵引术。

我在前线直接参加过几次战斗，这使我有机会亲自检查战地的医疗工作。在攻打敌人的堡垒时，我们通常能够在离战场 2 至 3 英里的地方，找到一个遮蔽处，这样就可以把伤员抬下来进行救治。当地的农民从一线把伤员和牺牲了的战士抬回来。因为没有路，除了一些轻伤员有时候可以骑马外，担架就成了我们唯一的运输工具。在我参加过的这几次战斗中，大部分的伤员都是被手榴弹炸伤的，或与敌人进行肉搏战时受的刺刀伤。由于缺乏子

弹，部队选择近距离作战。因为没有磺胺类的药，所有的创伤都引起了严重的感染，而且恢复的时间也拖得很长。因我带了一台显微镜，在极少的情况下，我还能给伤员输点血。因没有血浆，我们只能给伤员注射盐水来治疗休克。我们没有足够的葡萄糖，甚至连盐也都是当地生产的。

在前线，我们对伤员的抢救，通常能够在 1 至 6 个小时之内进行。但是，由于缺少器械设备，要救治那些腹部受伤的重伤员几乎是不可能的。外科所能干的，多半是清洗创口，去除异物和截肢。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挽救腹部受伤伤员生命的方法，但是，在前线，我们没有足够的止血钳、没有显微镜、没有能让病人从休克中快速苏醒的方法。前线的医生和医护急救人员不但要做医务工作，同时还要直接参加战斗。我们牺牲了相当多的同志。还发生过几起这样的情况：当医生留在伤员身边对他们进行抢救时，最后却为了不被俘虏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由于日寇对战俘的惨无人道，所以大部分人宁可自杀也不愿意被俘虏。

我在前线时，还医治了一些被毒气伤害的战士。有一次，日军使用了某种腐蚀性气体，幸好我及时赶到，对伤员进行了救治，才避免了皮肤溃疡和肺部损伤，伤员恢复得也较快。正因为我们的部队几乎没有什么防毒装备，所以敌人才用毒气来对付我们。我们所能提供的，只有那些装有活性炭和石灰的薄纱口罩，但这不是十分有效。

1943 年，敌人对我们边区发起

了大扫荡，我们不得不完全停止了学校和医院的全部工作。我们让伤病员躲藏在山洞里，学生们分散在当地的老乡中间。我自己与一个由教员和医务工作人员组成的非战斗分队统一行动。日寇攻击了整个北岳地区。这是晋察冀边区历来遭受的时间最长、最为残酷的一次扫荡。当地的老百姓遭遇最惨，不仅仅是他们的房子被烧毁，牲口和粮食被抢走或毁掉，还有许多妇女被强奸。日寇对老百姓实施了各种惨无人道的暴行：他们把婴儿扔进了滚烫的开水里、日军的军医还活体解剖了怀孕的妇女、并有日寇吃人的确凿证据——他们吃人的心和肝。（我曾亲自采访过几个逃出来的农民和战士）

在这次敌人的大扫荡期间，对非战斗分队来说，虽条件十分艰苦，但我们只牺牲了一两个同志。我们把整个医院搬进了大山里，把伤病员都分成小组，每个小组由一个医生和几个护士负责。大部分的伤病员都躲藏在山洞里，发给他们一些步枪和手榴弹。医生和护士除了给伤病员以必要的治疗外，同时还要参加战斗保护他们。大部分的山洞都在陡峭的山壁上，因此，敌人往往不敢贸然向我们发起攻击。有时候，敌人也用烟熏的方

法来袭击我们，但都没有成功。有一位医生因工作特别突出，被授予了英雄称号。他白天除了治疗伤病员外，还帮助护士做饭，并把饭挑进山洞里。晚上，他到山上去观察敌情，或者守在电话机旁等待有关敌人的消息。好几次，他一接到消息，就立刻设法通知所有的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尽管山洞与山洞间相隔几英里，需要翻山越岭才能到达。有一次，敌人发现了我们的一个山洞；洞里有两个伤员和一个护士。日军派了一个伪军前去喊话，要他们投降。但护士回答道，“我们这儿有枪，有 5 发子弹和许多手榴弹。如果你胆敢进来，我们就消灭你。”日军强迫伪军去攻打山洞，可没有一个伪军是活着回来的。终于他们熬到了晚上，敌军只得离开了。我所在的分队尽管是日军的重要目标，但一直都能成功地避开了

1943 年傅莱在抗日前线试发缴获的日本小钢炮



敌人。有一次，在神仙山，1 万多的日伪军包围了我们。可我们等到晚上，还是设法从距敌人不到 50 米的侧面悄悄地突围了出去。

在日寇扫荡期间，医院的任务或多或少只能是局限于给伤病员换敷料和发药。但每个医院都有一个手术小组，遇有紧急情况可立刻手术。在这次扫荡中，学生们都分散在老乡中间。我们给学生发了一些药，他们可以用这些药给老乡治病，同时老乡又保护了他们的安全。学校和医院所有的人员，都分散在半径 50 英里的范围内。这样，当反扫荡胜利结束时，我们就又能很快地重新聚在一起。甚至在敌人扫荡期间，我们也设法与一些学生保持着联系，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偶尔讲讲课。在以前的几次日寇扫荡中，学校都是统一集中行动的，因此没有中断过教学。但这次的扫荡，情

形的确是太艰难了。

1944 年秋，我在学校工作了近 3 年后，告别了晋察冀边区。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走了 700 英里来到了延安。

在延安窑洞与八路军领导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尽管延安的生活与前线不一样，但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不过我仍然希望能尽快地再回到前线去。与此同时，我在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授课，并通过阅读新的美国医学期刊，来刷新我那些生锈的医学知识。这些期刊都是美国医生和其他的朋友，



1942 年傅莱与林迈克在边区

如那些到延安来访问、并对我们的工作很感兴趣的“保卫中国同盟”和“美国援华委员会”的朋友们，送给我的礼物。

目前，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要用在培养青霉素菌的工作上了。

1945 年 3 月于延安

1943 年傅莱在白求恩卫生学校与他的学生合影



中日合作修复南京城墙 20 周年 纪念活动在南京举行

沈海婷

5月15日上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日本友好协会、江苏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公益社团法人日中友好协会在南京共同举办了旨在“铭记历史、维护和平、增进友谊、共创未来”的中日合作修复南京城墙20周年纪念大会。全国友协副会长林怡、江苏省友协会长吴锡军、南京市副市长储永宏和日中友协副会长酒井哲夫出席并致辞，日中友协前会长平山郁夫夫人平山美知子出席纪念大会。

中日合作修复南京城墙是20年前时任日中友协会长平山郁夫与中方一起倡导发起的，旨在修复文物古迹，医治战争创伤，期盼永久和平。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举办的本次纪念大会由日中友协本部及日本各地日中友协代表团、中日两国友好人士、各界代表、南京高校学生和近百名日本大学生，共计400余人出席。

林怡副会长在纪念大会上致辞感谢中日双方各界人士长期以来为城墙修复活动付出的大量心血和辛勤劳动。她说，20年来，中日合作修复南京城墙活动不仅修复了历经劫难、饱受战火洗礼的文化遗产，更在中日两国人民心中筑起了一道和平友好的长城。

林怡副会长表示，今年是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近年，中日关系经历了非常困难的局面，走过弯路，教训深刻。两国关系能否行稳致远，处理好历史等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问题是关键。“总结过去、开辟未来、铭记历史、永不再战”是两国人民心中共同的祈愿。期待通过回顾历史，加深理解和平对中日两国的重要性，让和平友好扎根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的心中，让年轻生力军参与到中日友好事业中来，为两国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世代友好的崇高目标而不懈努力。

日中友协副会长酒井哲夫在致

辞中表示，20年前的1995年适逢战后50周年。村山首相向全世界发表了内阁会议决定的“村山谈话”，向以中国、韩国为首的亚洲各国人民，对因战争带来的巨大伤害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道歉。“村山谈话”与“平山郁夫会长发起的南京城墙修复倡议”正是战后50年这个节点恰如其分的言行。

酒井副会长说，将于今年8月15日发表的战后70周年“安倍谈话”为世界所瞩目。日本国民期待“安倍谈话”完全继承被历届政府所继承的“村山谈话”，期待继前两次首脑会谈后日中两国首脑会谈能够顺利地持续下去。

江苏省友协会长吴锡军、南京市副市长储永宏分别致辞，指出活动的意义已远超南京城墙文化遗产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唤起人们的良知，加深理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实践意义，树立珍爱和平，反对战争的意志与决心。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珍惜由两国先贤与人民大众共同努力缔造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期待青年一代了解南京城墙这段不同寻常的历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实现中日世代友好合作的夙愿。

中日两国大学生代表在纪念大会上发言，表示南京城墙修复活动自倡议发起至今 20 年，见证了中日关系的起伏波折，也伴随了一代年轻人的成长。加深两国青年之间的相互理解是通往中日友好与和平之路的捷径。表示将以南京城墙修复纪念活动为

起点，传承友好，继往开来，共同谱写中日两国美好的未来。

当天下午，日中友协本部及各地方日中友协代表团、日本对华友好人士共 100 余人冒雨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敬献花圈，为遇难者默哀、祈祷冥福。日中友协副会长酒井哲夫表示，访华前，我们就历史问题做过功课，但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后更受教育。我虽了解这段历史，但很多亲历战争的日本老兵回国后，迫于压力也不开口谈论这段战争经历，对这一事实缄口不语，年轻一代对这段历史更是知之甚少。日中友协应当发挥作用，让日本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不让历史悲剧重演。酒井副会长还在纪念馆留言簿上留言：“日中世代友好，世界永久和平。”■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遇难者默哀



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四川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于 2015 年 5 月 8 日在成都隆重举办“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音乐会”（苏俄歌曲专场）。应邀出席音乐会的有云达忠先生率领的新西兰友好代表团，以色列驻成都副总领事雅各布，在川的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丹麦、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加拿大、秘鲁、澳大利亚、乌干达、赞比亚等国朋友、中外嘉宾和歌友共 400 余人。

四川省友协会长罗玉彬在音乐会前致词指出，今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日，我们相聚在四川成都，共同庆祝这一伟大胜利。七十多年前的一场浩劫，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和苏联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苏联派出的援华空军志愿队在中国英勇抗战，有 200 多名飞行员壮烈牺牲，其中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就牺牲在四川（现重庆万县）。今天我们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正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共同维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携手维护世界和平。

参加演出的成都高新区肖家河社区合唱团、成都苏俄民歌合唱团、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合唱团等以昂扬的激情演唱了苏联卫国战争歌曲和俄罗斯民歌，包括《神圣的战争》、《共青团员之歌》、《同志们勇敢地前进》、《喀秋莎》等，还演唱了中国的《游

歌声唱颂胜利与和平

川 友

击队之歌》、意大利的《啊，朋友，再见》以及乌克兰、新西兰等国歌曲。苏联卫国战争歌曲在中国广泛传唱，深为中国人民喜爱。当《喀秋莎》的旋律在场内响起来时，台上台下同声高唱，激动人心。

观看演出的外国朋友对这场音乐会给予高度评价。年过八旬的云达忠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说这场演出让我回到了抗战岁月，当时我住在成都，经历了日军飞机对华西坝的大轰炸，深深感受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新西兰当时也参加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太平洋战争，并为此付出了牺牲。新西兰人民和中国人民都热爱和平，我们有责

任教育年轻一代不要忘记历史，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美国朋友德尔夫女士是来自俄勒冈州的司法助理，她的父亲出生在四川宜宾，也经历了抗战岁月。她说，看到四川的大学生以发自内心的感情演唱《神圣的爱》，自己被深深打动，倍感欣慰。

历经 4 个多月的筹备和排练，



音乐会唱响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主旋律，为四川省对外民间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光彩，深化了四川与各国人民的友谊。■



李小林会长出席第十届济州论坛

卿伯明

应韩国济州论坛执委会主席文太暎和济州道知事元喜龙的邀请，李小林会长率全国友协代表团于5月19日至21日访问济州岛，出席第十届济州论坛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一同发表演讲的还有印

尼前总统苏希洛、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加拿大前总理克拉克等。

参会期间，李会长还会见了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和济州道知事元

喜龙，分别就中日关系和中日民间交流、中国省市与济州道的友好合作及友城关系等交换意见。

本届论坛以“走向信赖与和谐的新亚洲”为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约3000名代表出席论坛。■

参加论坛的各国嘉宾在开幕式上的合影



中非友协代表团访问塞舌尔和津巴布韦

黄笑薇

应塞舌尔外交和交通部、津巴布韦中国友好协会邀请，中非友协会长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率中非友协代表团于5月1日至8日访问了上述两国。

在塞舌尔，阿不来提会长会见了副总统富尔，外交和交通部部长摩根，指定部长兼社区发展、社会事务和体育部部长梅里顿，维多利亚市市长杰奎琳和塞工商会主席弗朗西斯。

富尔副总统代表米歇尔总统欢迎阿不来提会长率团访塞。他感谢中国在众多领域给予塞大量援助，始终与塞舌尔站在一起，为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说，很高兴看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的利益发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构想对非洲来说是一种激励，被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谈及。当前，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坚持从严治党，努力排除一切阻碍发展的不利因素，非洲国家从中学到很多经验。塞舌尔将继续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原则，不断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阿不来提会长高度评价中塞关系取得的发展成就并回应说，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新问题和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为了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发展势头。

与此同时，中方也愿与非洲国家分享发展经验，实现共同发展。

塞舌尔指定部长梅里顿表示，塞中民间交往和地方政府交流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塞舌尔虽是小国，

但首都维多利亚市市长是世界城地组织联合主席。塞希望成为连接中非的纽带，进一步推动双方在地方、商贸、旅游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外交和交通部长摩根表示，塞方将积极配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的各项活动，并进一步推动两国民间交往，让塞中友谊从政府向民间延伸。



塞舌尔副总统富尔会见中非友协会长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

津巴布韦副总统穆波科会见代表团





中非协会会长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一行出席中津建交 35 周年招待会

在津巴布韦，阿不来提会长会见了副总统穆波科、副总统姆南加古瓦，众议院副议长奇诺梦娜，地方政府、公共工程与住房部常秘姆利洛，与众议长穆登达、外交部部长蒙本盖圭等共同出席了中津建交 35 周年招待会，并与津中友协举行了工作会谈。

穆波科和姆南加古瓦两位副总统一致表示，津中友谊源远流长，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中国政府和人民就对津巴布韦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给予了宝贵的精神、道义支持和物质援助。津中两国在津独立当日即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建交 35 年来，中方始终对津巴布韦给予了大量支持，津中两国是全天候伙伴关系，两国人民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津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进一步推动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津巴布韦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希与中国分享治国理政以及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经验。两国友好协

会是促进两国人民经验交流的良好平台，对于增进友谊、促进合作十分有益。津方欢迎更多中资企业来津投资兴业，尤其是在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

基础设施领域开展合作。

津巴布韦众议院副议长奇诺梦娜表示，希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推动两国在立法领域合作。外交部长蒙本盖圭在两国建交 35 周年纪念招待会上的致辞中表示，津巴布韦诸多部长和政府官员曾访华学习，并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建设和管理经济特区等各项实践中，从而实现津社会经济转型计划。津中友协代

长、马尼卡兰省省长奇米妮表示，津中友协在中非友协的帮助下，开展了一系列人员交流活动，不仅加强了自身能力建设，更有效地推动了津中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希望继续得到中非友协的支持，使两国人民从津中合作中获得实际利益，让津中友谊世代相传。

阿不来提会长在各个会见场合均对中津关系的顺利发展表示满意，表示中方将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真、实、亲、诚”的原则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非洲的发展作出贡献。在民间层面，中非友协愿意通过各领域、各层面的深入交流，深化中非人民的相互理解，夯实中非友好的民意基础，为中非友谊持续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阿不来提会长还介绍了今年 8 月将要举办的第二届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情况，邀请津巴布韦地方政府代表出席，共商中非地方合作大计。■

塞舌尔外交与交通部部长摩根与代表团座谈



摩洛哥之行

艾林

应摩洛哥中国友好交流协会主席默罕默德·哈利勒邀请，全国友协亚非部巡视员扈健怀率全国友协工作组于5月24日至28日访问摩洛哥，出席由摩中友协与摩洛哥工业部、摩洛哥投资发展署合作举办的主题为“促进中国在摩洛哥投资”经贸研讨会。浙江省绍兴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友协会长谭志桂率团一行10人以及来自上海、山东、湖南的企业家代表10余人与会。

摩洛哥投资发展署署长哈米德·本·阿福迪尔在研讨会上指出，摩洛哥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与美欧签署的多项自贸协定，使摩洛哥具有极强的投资潜力，希望中国能认识到摩洛哥可以满足中国企业的发展要求，欢迎中国企业在摩投资，摩方愿意帮助中方开拓欧美和非洲的业务，使双方在经贸合作中获益。

中国驻摩洛哥大使孙树忠在讲话中介绍了摩洛哥具体国情、中国企业如何规避投资风险以及中摩两国关系。他指出，摩洛哥1956年独立，1958年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两国建交后，在双边和多边事务中彼此坚定支持，友好合作体现在政治互信、人文艺术交流等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双边经贸合作成为经济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当前，在全球化浪潮、中国工业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需要另寻出路、开拓国外市场。目前，有利于中国企业开展对摩经贸交流的因素包括双方政治互信、摩政局



“促进中国在摩洛哥投资”经贸研讨会现场

稳定以及包容性强。摩洛哥生产成本优势明显，劳动力生产水平高，宗教影响较小，旅游、农业、磷酸盐矿产资源丰富，中国企业适合在汽车、航空和电子产业领域投资。摩洛哥地处欧、非洲交界，丹吉尔港与西班牙最近距离为14公里，集装箱吞吐量占全球总量的20%，中国商品占丹吉尔港集装箱总量的40%。摩洛哥与56个国家签署了自贸协定，中国纺织品可以通过摩洛哥绕开欧盟纺织品配额出口欧洲，也可进入摩保税区，减免各种税收。近日，摩洛哥提出了2014-2022年工业发展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相契合，

希望中国企业到摩洛哥投资，同时以法律和协议的方式将合作模式固化。

扈健怀巡视员在讲话中代表全国友协和中阿友协对摩方举办经贸研讨会表示感谢，并向摩中友协的

代表团成员与摩中友协主席默罕默德·哈利勒在一起



老朋友表示亲切问候。他指出，丝绸之路将摩洛哥和中国联系在一起，摩洛哥著名航海家伊本·白图泰就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欢迎摩洛哥参加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全国友协十分重视同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开展合作，2001年成立的中阿友协举办了“中阿友好大会”、“中阿城市论坛”以及包括文化、学术、旅游、经贸、青年和地方政府交流在内的各类双边和多边活动。我会愿同摩中友协、摩洛哥工业部及摩洛哥投资发展署加强合作，推动中摩企业家实现互访，使中摩经贸研讨会活动机制化。

摩中友协主席哈利勒欢迎中方代表团与会，他指出，摩洛哥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和借助摩洛哥作为非洲大门的独特作用共同致力在非洲大陆的发展怀有强烈愿望。摩洛哥成为中国“一带一路”设想中重要一环的时机已经成熟，将成为中国投资者在摩生产产品运往非洲、欧洲和马格里布国家的桥梁。在默罕默德六世国王领导下，摩洛哥振兴的好势头也将成为各国投资者特别是中国投资者的驱动力。摩中友协将继续推动双方经贸、文化、旅游、艺术、体育等领域的友好交流，希望通过双边交流实现互利共赢。

研讨会结束后，摩方安排与会者赴拉巴特、丹吉尔和卡萨布兰卡三地考察科技城及自贸区等设施，两国企业家及机构负责人就开展双边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探讨，绍兴市还与摩洛哥相关城市探讨了建立友城事宜。■

一树石榴花 温暖两座城

西安·晋州“石榴花之春”活动演绎友谊“双城记”

赵政绪



2012年，陕西富平剧团在第五届石榴花之春上演出阿宫腔经典剧目《白蛇传》

西安和晋州，是中韩两国具有千百年历史文化遗产的著名古都，两座古城机缘巧合，都以石榴花作为城市的市花和象征。2007年，一个以两市共同的市花石榴花命名，以两国民间文化艺术演出为主要形式的友好交流项目——“石榴花之春”文化旅游交流活动在西安正式启动，此后每年在西安和晋州两地轮流举办，并通过卫星对开幕式进行跨国现场直播。到2015年，“石榴花之春”已进行到第八届，成为西安和晋州友谊“双城记”的一张亮丽名片。

今年4月18日，第八届“石榴花之春”活动在晋州举行，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开幕晚会、非物质

文化遗产艺术展演、美丽西安摄影展及中韩青少年足球赛呈现出更多的夺目新亮点。

活动开幕式上，韩国艺术家们奉献了经典歌舞《阿里郎》、沙画表演、传统国乐、晋州剑舞以及动感街舞等节目。中国演员带来的大型舞蹈《丝路情韵》，艺术地诠释了古代中国通过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把友谊和文化向世界传播的主题。民族舞《兰花花》演绎了黄土高坡的情韵。

“石榴花之春”也给了韩国观众零距离触摸西安、了解中国文化的绝佳良机。在风景宜人的晋州南江江畔，来自西安的皮影雕刻、脸谱绘画、桃雕、剪纸、中国结编织

的工艺师们轮番展示各色绝技，引来众多晋州市民驻足观看。

来自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的少年足球队和晋州少年足球队在晋州体育运动中心进行了中国西安——韩国晋州“石榴花杯”足球友谊赛，志丹队 2 比 1 获胜。不到 15 万人的志丹县是中国第一个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试点县，青少年足球活动发展蓬勃。这次志丹足球队的小队员们远赴韩国同晋州小球员们同场切磋交流，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足球从娃娃们抓起，友谊从下一代做起”的主题。

在“石榴花之春”举办期间，西安广播电视台还与晋州西庆放送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双方将合拍电影《美丽乡村》，介绍户县农民画发展历史以及发生在两国年轻人之间的爱情故事。

历届活动期间，韩国当地报刊和广播电视媒体和中国中央和地方新闻单位对活动进行了全方位报道。第八届“石榴花之春”期间，西庆放送几个频道全天滚动播出活动情况，韩国《釜山日报》等媒体对活动也进行了追踪报道，西安广播电视台以及西安网、乐视网等网络媒体对开幕式和中韩少年足球友谊赛进行了视频直播。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朝闻天下》、《第一时间》等栏目进行了连续报道。

“石榴花之春”用文化艺术交流，开启了西安和晋州友好合作的新大门，带动了两市经贸、文化、旅游、交通全方位的交流合作。“丝路乐章、声动晋州”



中国志丹少年足球队与韩国晋州少年足球队在首届“石榴花杯”足球友谊赛上

主题的确立，使这一活动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战略紧密结合。同时，“石榴花之春”也朝着开展深层次双边合作、发展文化产业、促进双方共赢多赢的方向发展。西安广播电视台和西庆放送商定今年 9 月在西安共同举办一场中韩大型演唱会。西庆放送旅行社还与西安新世界航空国际旅行社签订了

西安—晋州旅游合作协议，通过两地旅行社加强旅游互通。

西安广播电视台台长惠毅表示：“我们要牢牢抓住传统文化交流这个切入点，让民族的东西成为西安对外交流和走向世界的纽带，今后要开展更深层的文化产业项目合作，让‘石榴花之春’成为响当当的对外交流知名品牌，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作出贡献。”■

2015 年，韩国艺术团体在第八届石榴花之春上的精彩演出



铭记历史、增进友谊、面向未来

——记 2015 年第一批日本大学生代表团访华

刘莉莎

应全国友协邀请，以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友好协会常务理事小野寺喜一郎为团长的日本大学生代表团一行 98 人于 5 月 14 日至 20 日访问南京、苏州、上海、北京等地，参加中日合作修复南京城墙 20 周年纪念活动，并与中国大学生开展交流。代表团成员分别来自日本 39 所高校，覆盖日本 21 个都道府县，具有广泛代表性。其中约一半团员系首次访华。

参加中日合作南京城墙修复 20 周年纪念活动，铭记历史，传承友好，面向未来。此次访华行程密切配合中日合作南京城墙修复 20 周年纪念活动，该活动旨在通过中日双方努力修复被战争摧毁的文化古迹，医治战争给人们心灵造成的创伤，同时也唤起人们对中日友好与世界的向往。5 月 15 日在纪念大会上，全国友协副会长林怡指出，“总结过去、开辟未来、铭记历史、永不再战”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心愿，并鼓励两国年轻人，应通过回顾历史，加深理解和平对中日两国的重要性，让和平友好扎根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心中，让年轻生力军参与到中日友好事业中来，为两国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世代友好的目标不懈努力。

代表团在参加纪念活动的过程



日本大学生代表团参观苏州寒山寺

中，了解修复南京城墙这段不同寻常的历史，真实感受两国民间友好的优良传统，切实体会到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两国大学生纷纷表示，愿以此次活动为起点，铭记历史，传承友好，共同谱写中日两国美好的未来。

与中国多所大学进行交流，增进两国同龄人了解与友情。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南京大学、东南大学、苏州大学三所地方著名高等学府，通过专题座谈、文艺演出、一对一交流等方式，和当地大学生结下了深厚友谊。三所大学精心设计安排交流活动，真实立体地展现了中国

大学生的校园学习生活风貌，传递出互学互鉴、期盼友好的积极信息。活动结束后，两国学生依依不舍，情景动人。团员们均表示，学校交流毕生难忘，消除了以往仅通过媒体对中国形成的偏见和误解，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回国后将此访见闻与亲友分享，希望将来成为两国之间友好的桥梁。

此外，代表团学生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人民网、国际广播电台、江苏广播电视台等多家中央及地方媒体的采访，讲述对于中日关系的所思所悟，分享和中国人民亲身接触中的感动，传递出中日友好的坚

土耳其太空营地组织代表团访华

艾林

营地为各国青少年提供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希望他们通过参与营地的活动，建立友情，学会彼此尊重，了解世界各国文化的多样性。土耳其太空教育营地组织希望与全国友协加强合作，为促进国际青少年交流这个共同目标而努力。

埃尔索伊大使表示，全国友协与土中友协、土中妇协以及土耳其太空教育营地的合作为推动中土友好交往发挥了积极作用。土耳其驻华使馆愿与全国友协继续保持合作，进一步推动缔结友好城市与开展两国文化交流。

代表团在成都访问期间，与四川省对外友协就探讨开展经济区建设方面交换了意见。土耳其太空营地组织由位于土耳其伊兹密尔市的爱琴经济区创建，伍德汉姆表示愿意积极推动爱琴经济区与四川省开展经验交流。在桂林期间，外办副主任宁松向代表团介绍了桂林市与土耳其穆拉特帕夏开展友城交流的情况。伍德汉姆欢迎桂林市在开展友城交流时顺访伊兹密尔，探讨开展青少年太空知识培训方面的合作。■

应全国友协邀请，土耳其太空营地组织主任斯科特·伍德汉姆一行 5 人于 4 月 26 日至 5 月 4 日访华。全国友协副会长林怡宴请了代表团，土耳其驻华大使阿里·穆拉特·埃尔索伊参加了宴请。代表团还访问了成都、桂林和上海，参观了成都光亚国际学校和上海航空科普中心。

林怡副会长欢迎伍德汉姆一行访华，代表全国友协感谢土耳其太空营地组织自 2009 年以来连续 7 年为中方提供奖学金，并通过全国友协安排中国学生赴土耳其参加国际太空夏令营。今年，全国友协将组派 17 名湖北省中学生参加夏令营。土耳其是全国友协重要的工作对象，多年来，全国友协与土中友协、土中妇协和土耳其太空营地组织保持了频繁的交流，成为推动中土民间友好关系发展的重要渠道。

伍德汉姆主任感谢全国友协给予代表团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他表示，土耳其太空营地长期与美国航空航天局合作，培训 9-15 岁的各国青少年。同时，

定信念。

谈到此行的感想，代表团成员冈山大学学生高井智光说，通过这次交流活动认识到了日中之间了解历史的重要性，以及日中青年之间交流的重要性。来自关西大学的村田可惟人深有感触地说，实际见到的中国人与在日本电视上看到的中国人完全不同，在与中国学生的交流中发现，原来大家都是一样的。曾在北京留学一年的佐贺大学学生原穗子说，在这次活动中再次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友好，也更加喜欢中国了。在立命馆大学学习并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开展中日学生交流的 3 年级学生浓野司给记者讲述了一个小花絮。他说，来北京的时候，他们乘坐的飞机在降落过程中经历了颠簸，有一个同学受到了惊吓，身体不住地颤抖，正当此时，邻座的一位中国女乘客伸出手来握住了这个学生的手，并用中文安慰说“别担心，没事的”。浓野司表示，这件事让他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友好和温暖。

团员们纷纷表示，通过此次访，不仅了解到正视历史的重要性及改善两国关系的紧迫性，也感受到一个真实、客观、立体的中国，与中国同龄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今后愿为中日友好的事业出一份力。■

代表团参观上海宇航中心



舞剧《朱鹮》访日巡演

马玉华

6月11日晚，创价大学池田纪念讲堂座无虚席。这里正在进行上海歌舞团舞剧《朱鹮》进校园公益演出。演员精湛高超的舞技、唯美的音乐和凄美动人的故事，把三千多名年轻观众带入到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赢得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上海歌舞团舞剧《朱鹮》访日团于5月31日抵达日本，在仙台市首演后，6月4日在东京迎来了此次访演的重头戏。当晚，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与部分国家驻日使节及日本各界友好人士等近两千名观众一起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程永华大使看望了全体演职人员。表

示舞剧《朱鹮》表演精湛，反映了鲜明的时代主题。同时，朱鹮是中日友好的象征与使者。上世纪朱鹮在日本一度绝迹，1998年中国向日本提供一对朱鹮并开展合作研究以来，朱鹮种群再次在日本繁衍生息，为中日友好交流与合作留下一段佳话。因此，该剧也向日本人民传递了中国人民对两国世代友好的美好祝愿。

此次上海歌舞团舞剧《朱鹮》是由全国友协派遣，应日本民主音乐协会邀请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访日巡演，将在日本29个城市演出57场。■



朱鹮的童话 ①

顾子欣

第一章 寻找

1

它们当真已灭迹了吗？
那些吉祥鸟
那些东方宝石

曾经有辽阔的天堂
在西伯利亚，在乌苏里江岸
曾在长白山麓衔枝营巢
曾长唳声声飞过秦岭
或轻举纤足闲步江南

曾是扶桑国的圣鸟
养尊于宫苑，受宠如王子

2

长喙，凤冠
艳红的面颊如施粉黛
细长的双腿也红红的
如裹着红丝袜，穿着红舞鞋
而一身羽衣洁白如雪
当高栖于枝羽冠在风中飘动
似佳人遗世而独立
当展翅如轮翱翔于天
又似绯红的霓云②
它们当真都灭绝了吗？

3

多赋诗意的名字：朱鹮
鸟中之贵族，禽中之仁者
雅贞和寿，四德之鸟

乌鸦和青鼬常来争巢毁蛋
但真正的毁灭来自另外的方向
来自网，来自枪口
来自黑压压的楼群
和一张张油污的餐桌
来自绳索般的公路
和撒在田里的死亡的粉末……

也许还有劫后余生吧？
也许会残留两三只？
但搜索 9 省，跋涉 5 万里山河
也不见它的影子

4

在秦岭的大山里
有个小小的村庄
村里的孩子想走出山去
看外面的世界是啥样

没想到在放学的路上
遇到从山外来的人
来山中寻鸟的人

“小朋友，你在这儿见过大鸟吗？”

“大鸟？见过呀！”

“不就是红鹤吗？”

“什么？你说是红鹤？”

“它在哪儿？红鹤在哪儿？”

寻鸟人像突遭雷击
心像要跳出胸膛

红鹤就是朱鹮的别名啊
莫非它在这里隐藏？

在一片水田边
守候着寻鸟人和村长
和那个孩子
和重新点燃的希望

飞来了，从山谷那边飞来了
像绯红的云，像仙人
一只、两只……
落在一棵大树上

第二章 相思

1

汉中。洋县。姚家沟
一块丰饶的平原，像巴掌
夹在巴山秦岭间
汉江、嘉陵江从旁流过
絮说着孔明用兵、蔡伦封侯的旧事

红鹤飞来了，村长很淡漠
孩子们也不以为奇
在山上，他们还见过
熊猫和金丝猴呢！③

寻鸟人在大树旁搭起窝棚
寻鸟人变成了养鸟人
他们数了数：4只大鸟
3只幼雏。可算得一个
种群，一个家族

他们看鸟儿筑巢，在巢里
铺上玉米秆、树叶和草根
啊！一只小鸟被挤出巢
掉到地上了！于是被捡起来

千里迢迢送到了北京④

小朱鹮在北京长大了
起了个名字叫华华
它有了新的屋舍和憩园
它还会思念自己的老家吗？

2

在东瀛，在佐渡岛
也有朱鹮的一片故土
岛上人叫它桃花鸟
还有个拉丁名 Nipponia Nippon

如果你要去日本
你怎能不去佐渡呢？

去看那海湾的碧涛和峭壁
去游岛上千年的杉树林
看巨岩如野龟屹立在海中
黄萱草掀起金黄的波浪

佐渡出黄金。去当一回
镰仓时代的金矿工
去舞鬼太鼓，去听佐渡民谣
去驾乘木盆舟，头戴竹斗笠

3

当朱鹮在汉中又传宗接代
朱鹮在佐渡却将断香烟

园中的6只鸟，5只
不能生育。还剩1只阿金
虽风韵犹存，也徐娘半老

全岛的每片树林，每块岩石
都已搜遍了，再找不见
一根野生的羽毛

而从札幌到冲绳
电驰风掣的新干线
也早驱走了朱鹮的梦

4

四海之内皆兄弟
天下朱鹮也是兄弟

在地球上生活了 6 千万年
如今只留下这两个巢
汉中和佐渡啊，两个孤子
两个隔海相望的兄弟

为了共同的生存和后嗣
为了深远的相思
华华登上了佐渡岛⑤

给华华选个新娘吧
阿青不行，她患有风湿病
娶阿金吧，她显得很多情

新婚燕尔，两口子形影不离
但就是——不受孕
该怪谁呢？新娘偏大了吧？
可惜这美好但无结果的婚姻

第三章 希望

1

多次联姻，都没有成功
让两国养鸟人忧心忡忡

两亲家细心伺候着，盼啊盼
就盼能抱上一个
在佐渡出生的小朱鹮

又恐怕日本海不平静
风生水起，多变的政治风浪

会不会阻挡鸟们的来往？

直等到友友和洋洋来⑥
是天公作美？或精诚所至？
一条小生命，一个爱的结晶
诞生了！优优诞生了！

热泪闪烁在养鸟人的眼帘
用双手抱起优优
就像抱起十世单传的婴儿

2

在佐渡，在森林公园里
有一块鸟的石碑
阿金站立在那碑上
依然满眼风情

日本的最后一只野生朱鹮
一只美丽的长寿鸟
它活到了 36 岁

虽然膝下无儿
毕竟曾有过跨国恋情
有过一段罗曼史

是命运注定了它
要成为不朽
成为一块石碑
一个传奇

3

而在汉中的土地上，在家家
炉灶前，如今也烘烤着
两国养鸟人的故事

共同守护一个刚出生的小鸟
就像守护一个易碎的宝瓶
一起用高倍望远镜观察

在野外放飞的朱鹮
就像联合侦察兵

一条蛇爬上树，将袭击
巢里的鸟。得把它抓下来
我去吧，我会爬树
不，我去，我比你年轻

放飞基地上没有公路
便一起用背篓将食粮（包括
朱鹮的）背上山去……

享受着人鸟同乐
看镜中却青丝成霜
他们在放飞朱鹮
他们在放飞希望

4

虽还是弱小的种群
却给地球上濒危的物种们
点亮了一盏灯塔

红鹤飞进了小学教科书⑦
桃花鸟带着邮戳
飞至世界的各个角落

这星球是一个大舞台
人类不能演独角戏
飞禽、走兽各有自己的角色
乃至一只小小的昆虫

天鹅们在湖上
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里
与王子翩翩起舞

也让朱鹮们，让东方之鸟们
舞起来，飞起来吧
在复活的童话里

让我们的星球啊，因这
舞蹈，因这飞翔，而多几分
吉祥，多一些美丽

2012.7.13. 完成

①朱鹮，学名为 *Nipponia Nippon*，属鹮目，曾分布于俄罗斯、中国、日本、朝鲜，近百年急剧减少，成为稀世珍禽。1960年在国际鸟类保护会议上被定为国际保护鸟。朱鹮在其他地方已经绝迹。在中国1981年朱鹮被发现后，经过精心培养，雏鸟逐年增加。在日本最后的几只朱鹮也濒临夭亡。后中国多次赠送朱鹮给日本，终于在佐渡成功繁殖后代。并经两国科学家合作，使野外放飞朱鹮也取得了成功。

②朱鹮羽毛表面为白色，内为淡红色，故展翅飞翔时，呈现粉红色。

③熊猫、金丝猴、羚羊、朱鹮为汉中东四宝。

④1981年在姚家沟发现朱鹮时，有一只小鸟被挤出鸟巢，后被科学家捡起，送到北京动物园，饲养成活。

⑤1985年，中国送朱鹮华华到佐渡，与当地雌鸟阿金人工交配，但没有成功。

⑥1999年，中国赠送日本一对朱鹮友友和洋洋，同年在佐渡繁殖成功，生下小朱鹮优优。

⑦中国小学语文教科书里有关于朱鹮的课文。中国和日本都曾印制朱鹮的邮票。

当代以色列代表作家介绍

宫旭

全国友协对以文化交流现状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二战期间，中国人民和犹太人民互相帮助的感人故事，成为中以两国人民称颂的佳话，奠定了两国人民深厚的传统友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作为中国成立最早的从事民间外交工作的全国性人民团体之一，多年来重视加强同以色列的民间友好交流，与以色列中国关系促进会、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以色列城市经理人协会、以色列中国友好协会等多个组织保持了长期友好交往，双方通过互访、考察等活动，在加

强两国经贸、科技、农业和地方政府交流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尽管中以两国于 1993 年签署了文化交流协定，但相对于双方政治经贸而言，两国文化领域交流的影响范围还有待扩大，全国友协在促进中以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目前也尚处于起步阶段。以色列的文学、音乐、美术、舞蹈和博物馆事业发展较为成熟，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尤其是以色列当代文学，充分反映了犹太民族的历史、宗教和以色列建国的历程，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学的鲜明特点，在当代世界文坛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将着重介绍当代以色列文坛代表作家，希望对了解以色列当代文学，为我会开拓对以民间文化交流提

供有益思路。

当代以色列代表作家

以色列文学自建国开始呈现三个阶段特点：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 40 年代以色列建国初期，体现犹太民族集体价值观和对新生活的希冀，主要表现为文学服务于国家；第二阶段是从 50 年末代开始的“新浪潮主义”，体现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和自我价值的寻求；第三阶段是从 70 年代后期开始的文学多元化时期，东方犹太文学开始兴起，更倾向于关注个人，以“自我”为主体进行创作。当代以色列文坛影响力最大的是号称“希伯来语文学三巨头”的三位作家。

2014 年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组派市长代表团访华



（一）阿摩司·奥兹



阿摩司·奥兹 (Amos Oz) 被誉为当今以色列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也是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多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奥兹于 1939 年生于耶路撒冷，父母都是受教育程度很高、崇尚欧洲文明的欧洲犹太人。奥兹 12 岁时，母亲自杀身亡，两年后，他的父亲再婚。家庭的变故对少年奥兹的心理产生了强烈震撼，年仅 14 岁的奥兹搬出了家，进入了胡尔达基布兹，并将自己的姓氏从克劳斯改为奥兹（希伯来语代表“力量”）。1960 年，奥兹在基布兹结婚，后育有三个儿女。一直到 1986 年，奥兹全家才搬出基布兹，到内盖夫沙漠边的小镇阿拉德居住。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奥兹发表了《我的米海尔》、《黑匣子》、《了解女人》、《莫称之为夜晚》、《爱与黑暗的故事》等 12 部长篇小说，《胡狼嗥叫的地方》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以及《在以色列国土上》等多篇杂文、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包括阿拉伯语在内的 40 多种语言，曾获多种英

美文学奖项，并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奥兹的作品非常关注身边的人和事。长期在基布兹生活的经历，使奥兹体会到了“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的中心”的道理，明白了可以通过记叙身边的人和事创作出卓越的文学作品。他创作的《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 年）、《直至死亡》（1971 年）、《鬼使山庄》（1976 年）和《沙海无澜》（1982 年）等小说，大多以基布兹生活为背景，叙述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事，将深刻的主题通过对微缩社会的描写展现出来。

奥兹一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主张巴以通过妥协实现和解。奥兹的文学作品从多种角度展现出两个民族是如何从相互尊重到相互仇视，甚至兵刃相见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不仅表达出对犹太民族身世多艰的哀悼，也流露出对阿伯拉民族遭受苦难的深深负疚。在小说《我的米海尔》、《游牧人与蝮蛇》等作品中，作者运用隐喻的方式，阐述了敏感而尴尬的阿以问题，他同情这两个民族，提出双方要互相包容、和平解决民族争端问题。

（二）亚伯拉罕·巴·约书亚



亚伯拉罕·巴·约书亚 (A. B. Yehoshua) 是与阿摩司·奥兹齐名的当代以色列优秀作家，生于耶路撒冷。他的父亲是第四代居住在耶路撒冷的西班牙裔犹太人，即塞法尔迪犹太人，多年致力于东方学研究。约书亚曾于 1954 年至 1957 年服兵役，继而就读于希伯来大学，毕业后在中学任教。1963 年至 1967 年赴法国学习，回国后在海法大学任教，现任比较文学教授。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相继发表了《老人之死》、《面对森林》、《1970 年初夏》、《三天和一个孩子》等短篇小说，从 70 年代后期开始致力于长篇小说创作，《情人》、《迟到的离婚》、《曼尼先生》、《通向世纪之末的漫长旅行》等等。作为工党中一名活跃成员，约书亚还发表许多政治随笔，并著有随笔集《在权力与权力之间》。

约书亚在创作手法上主要受到希伯来语作家阿格农、犹太作家卡夫卡和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影响，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福克纳。他的小说多以社会边缘人物为主人公展开叙述，善于运用象征主义手法，反映出对以色列国家内部某些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的思考。

约书亚的作品关注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生活，为他们呼吁平等权利。他的经典作品《面对森林》以本土以色列青年护林经历为主线，描写与主人公朝夕相处的阿拉伯人的生活。小说通过象征手法，指出年轻一代以色列犹太人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国家，理解民族的历史与未来，以及年轻一代以色列犹太人和阿拉

伯人应该如何交往等问题。

不同犹太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是约书亚深入探讨的问题。在小说《五季》中，作者通过描述作为东方犹太人的主人公与欧洲犹太人后裔的妻子结合产生家庭的矛盾，表达了接受过文明熏陶的欧洲犹太人，将自己的文化灌输到整个社会时，对东方犹太人带来的莫大压力，探讨了欧洲犹太人对东方犹太人文化的影响，指出许多东方犹太人在期盼获取欧洲文化的同时，忽略了争取人格平等的重要性这一事实。

（三）大卫·格罗斯曼



大卫·格罗斯曼 (David Grossman) 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色列文坛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与阿摩司·奥兹、约书亚被誉为当代希伯来文学三巨头。大卫·格罗斯曼 1954 年生于耶路撒冷，父亲在 1936 年从波兰移居巴勒斯坦，母亲是本土以色列人。格罗斯曼从小热爱阅读，从九岁起就为以色列广播电台做少年记者，成年后在以色列电台做了多年编辑和新闻评论员，1988 年因不满报道自由受限而辞职。他

育有三个儿女，次子乌利在军队服役期间于 2006 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丧命，年仅 20 岁。

格罗斯曼从 80 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作品被翻译成 20 多种文字，拥有广泛国际影响，曾获多种国际奖项，并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主要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羔羊的微笑》、《证之于：爱》、《一起奔跑的人》、《我的身体明白》、《躲避消息的女人》等；随笔集《黄风》、《在火线上沉睡》、《狮子蜜》，以及短篇小说、木偶剧和儿童文学作品。

格罗斯曼在小说中试图用理性的方式来对待大屠杀记忆和民族历史。他的经典小说《证之于：爱》打破了以色列社会政治话语中形成的只有大屠杀幸存者才能描写大屠杀，采用现实、想象、奇幻等手法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的生活描写，反映出一代人对大屠杀的集体记忆。

格罗斯曼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长期以来，他都试图通过政论、小说和访谈等形式剖析以色列充满冲突的现实，呼吁巴以两个民族回归和平，并亲身参加了许多倡议国际和平的抗议活动。他曾亲自到访巴勒斯坦难民营，随笔集《黄风》如实反映出难民营贫困破败的生存状况，受到国内外极大关注。《在火线上沉睡》则将视角投向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居民区，提出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状况遭到忽略的问题。

中以文化交流展望

奥兹曾于 2007 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邀请，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其间，在北京、上海两地接受了新华社、国际台、《人民日报》、《南方周末》、《东方早报》等多家媒体专访，与出版过奥兹作品的上海万语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译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知名文化界人士和媒体见面，并在社科院和北京大学等机构做了多次演讲。奥兹访华期间表示从小就一直向往中国，读过沈从文和莫言的书，十分喜欢中国，而且他还与作家莫言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就文学创作进行了深入探讨。奥兹访华的媒体宣传覆盖力度空前，该活动在加强中以学术交流，促进民族文化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也对全国友协今后对以文化交往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以两国自 1992 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已经迈入了第三个十年。在两国经贸关系飞速发展的同时，如何在传承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基础上，摆脱相隔万里的地域障碍，将对以民间外交“向深处做、向实处做”，对全国友协今后对以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文学介绍是文化交流的一扇窗户，打开这扇窗户，向中以两国人民更多地介绍两国文学，加强人文交流，不仅有助于发展双边文化交流，更有利于两国人民了解彼此国家和社会，进一步拉近双方民众心与心的距离。今后全国友协还可以探索包括文学、艺术、音乐、展览在内的文化各领域与以开展合作，续写中以民间文化交流新篇章。■

溥仪与国际友人谈从皇帝到公民的蜕变

汤铭新

回想新中国诞生以后的最初年代，西方世界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敌视，对我国不但采取了封锁包围的扼杀政策，而且在国际上还制造种种攻击我们的流言蜚语。因此，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如何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是刻不容缓的历史重任。正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等我国老一代领导人亲自关怀和指导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启步开航，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其中我为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当翻译，听他向国际社会各界人士讲述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可以说构成了当时民间外交的一个重要篇章，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而积极的反响。

“皇帝热”赢得了中国的良好形象

1959年10月，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欢庆年轻的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的无比喜悦之中的时候，传出了震动世界的特大新闻：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议，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宣布，决定对末代皇帝溥仪予以特赦释放。消息传来，顿时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一时间，末代皇帝溥仪成了人们关注的人物。关心新中国成立和发展的各国友好人士纷



毛泽东主席会见溥仪

纷要求会见溥仪。国外政界和新闻等各界人士也专程来华座谈、采访，多种报道接踵而至。可以说，一时间掀起了一股“皇帝热”。1960—1967年间，我一直为溥仪当翻译，所接待的来自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外宾数十批。

1964年7月，溥仪在与阿根廷议员团座谈时，一位外宾用试探性的口气问道，在世界许多国家，每当封建制度被推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之日，就是末代皇帝被送上断头台，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之时。为什么中国政府非但没有对您处以

极刑，还要挽救您并给予您新生呢？溥仪说，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无论是被苏联红军看管在哈巴罗夫斯克，还是后来被遣送到中国东北的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最大的恐惧便是自知迟早要以叛国罪被处以死刑。1946年8月，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灭绝人性的罪行时，对自己的罪责并不想承担。但在后来学习和改造自己的过程中，大量事实教育了我，要深刻清算自己的罪过，走上重新做人的道路。抚顺管理所一位领导对我说，共产党要改造世界，

首先要改造人。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和其他会议上的讲话中多次指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共同奋斗。溥仪说，他听了以后内心既震动，又温暖，因为想到自己还有救，甚至还能为建设新社会出力。

联系到此前和此后在接待各国外宾时，溥仪通过介绍自己从皇帝到公民的亲身经历，回顾中国近代以来所遭受的屈辱以及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当家作主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在外国友人中大大消除了西方舆论对我国铺天盖地的歪曲宣传的影响，而且也使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新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以至原来对新中国持有怀疑态度的一些人士，也不得不表示叹服。他们回国后，有的向议会和政府作报告，有的在报纸杂志上发表

文章，纷纷赞扬新中国，主张与中国发展关系。而其中都少不了与溥仪座谈的篇章。我清楚地记得，那段时期，我经常收到外国友人从远方反馈的消息。一位智利新闻工作者还寄给我发表他访华观感的连续报道，其中一篇的醒目标题是：《末代皇帝为新中国赢得了更多的朋友》。

从“人性泯灭”的忏悔到 “脱胎换骨”的新生

1960年，我陪同玻利维亚议员代表团同溥仪进行座谈。代表团中一位左派议员首先发问，他直截了当地说，“国外对您的议论褒贬不一。我们想知道，您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您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道路？”溥仪略加思索回答说，他经历的是从“人性的泯灭”到“人性的复苏”的过程。1908年12月他两岁半时，

被抱着登上了龙椅宝座。那天他因受惊吓大哭不止，被宫中认为是不祥之兆，长大后命运将十分坎坷。这虽是迷信的揣测，想不到不幸而言中。他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开始读书识字的第一课是圣人教诲的《三字经》，上面开宗明义的第一句便是“人之初，性本善”，讲的就是“人”和“人的本性”。但是，对“人”的真正认识和懂得“做人”的道理，却是在他对国家和民族犯下深重罪孽和进行痛苦的反省和忏悔以后，在他对自己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在人生道路上进行根本的转变，从而“重新做人”以后。

在1965年与秘鲁中国文化协会代表团的座谈会上，秘中文协领导人阿尔赛，他亦是秘鲁著名记者，说：“末代皇帝成新人，这在我们看来简直好像是天方夜谭。但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做到了，这使我们感到

1961年的五一节，溥仪与李淑贤举行婚礼



无比的钦佩。”他希望溥仪先生早点把这部历史写出来，套用中国人常说的话，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末代皇帝如何“从鬼变成人”的经历，从而增进对新中国的认识，阿尔赛感慨地对我说，溥仪引用中国的古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反省自己，说只有提高自己的品性，而后才能整治好家族，然后治理好国家，才能使天下太平，人民安康。而他这个末代皇帝却完全与此背道而驰，给国家、民族、家庭造成了无穷的灾难。溥仪说得好，他为新生以后的后半生感到幸福。因为第一，他成了自食其力的公民，不做寄生虫，摆脱了耻辱生活的阴影；第二，他已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不再是听人摆布的傀儡，更不是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祸害的始作俑者；第三，他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温馨家庭。

毛主席和周总理 的亲切关怀

1965年9月，溥仪与秘鲁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座谈时，奥尔维戈索团长问溥仪：“您和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关系如何？”溥仪说，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每次和他们会面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令他终生难忘。最初的感受是1956年5月，他的叔叔载涛和三个姐妹来抚顺管理所探望他。原来1954年当选人大代表的载涛在全国人大开会时，周总理把他引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握住他的手说，“我听说溥仪学习得很好，有不少进步，为什么不

去看看他呢？现在全国人民都翻了身，这中间就包括满族人民，也包括你们爱新觉罗家族。”周总理插话说，“翻身当家作主人，就是要全国各族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溥仪来说，就是要脱胎换骨地改造，彻底抛弃过去，成为对新社会有用的人。”溥仪听他叔叔转达的这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他说，想不到日理万机的中国两位最高领导人对一个关押的罪犯如此关心，鼓励他弃旧图新。再联想自己成天打人算盘过日子，简直无地自容。从那以后，他的心头卸下了沉重的包袱，努力改造好自己，便成为他生活的目标。

接着，溥仪又回忆起1964年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他举行的那次温馨的宴会。毛主席问他现在的生活安排得如何，过一个普通公民的生活有何感受等等。溥仪告诉毛主席，他已开始了新的生活。1960年3月，他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他学会了播种、灌溉、施肥、护理，把花卉栽培得生机盎然。他不仅受到了夸奖，而且开始体会到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幸福。他还参加了天安门游行，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在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中，他自己感到融入了人民的队伍，感到为和平、为正义奋斗的光荣。1960年11月，他兴奋地拿到了公民证去投票站行使公民投票选举的权利。他又感受到同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分享当家作主的骄傲。总之，他体会到了毛



溥仪

主席说的重新做人的教诲的深刻性。毛主席幽默地说，你是中国皇帝，现在开始了新的生活，可许多人不相信呢！他们说我们共产党“共产共妻”，简直是“洪水猛兽”。溥仪说，“自1956年下半年开始，不断有外国友人和记者采访我。近几年世界各国人士要求与我座谈的也越来越多。所以，我正准备写一本书，让世界了解我一生中两段截然不同的经历和中国大地发生的变化。”周总理说，对啊，这就是你的前半生和从皇帝到公民的变化，应该写出来。

毛主席和周总理一直很关心溥仪，还专门派医生为他治病。在“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毛主席专门指示要保护好他，说“我们都是他的子民，他应该过得比我们更好”。这样才避免了红卫兵对他的进一步冲击。

作者汤铭新，曾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美大部副主任、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秘书长，中国前驻玻利维亚、乌拉圭大使。

拳拳爱心献中华

——怀念老友爱泼斯坦

陈一心

不久之前，我以耄耋之龄，怀着一种恋旧之情，独自一人来到了位于上海长阳路62号（原华德路62号）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在一家茶馆的临窗位置落座，午后的阳光从窗外斜斜地射在桌上，于是我回想起28年前的那段珍贵的往事：记得也是这样的一个午后，阳光从窗外斜斜地射在桌上的时分，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一边和我品着咖啡，一边讲述他的家族史。

我默默地想，我尊敬的老友爱泼斯坦生于1915年4月20日，倘若他仍在世的话，今天恰好是他一百岁华诞。而今，斯人不在，音容却常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他中等的身材，棕色的头发已经略略变白，那张露出谦和笑容的圆圆的脸庞，那双洋溢着活泼而又带有睿智的双眼，总是给人一种亲切感。

“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充满激情的话语，时常在我的耳畔回响，而我与这位老友在18年之中（1987——2005）相识相知、把袂而谈的一幕幕场景，也如同过电影一般地，瞬间呈现在自己眼前。

一个老战地记者的演讲

我与爱泼斯坦的初起相识缘于1987年3月在沪举行的“三S及其他国际友人在上海”国际研讨会。三S，即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三位美国优秀的作家和新闻记者。当时，我作为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负责接待与会嘉宾和学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即是此次研讨会的受邀嘉宾之一。他虽是白皮肤、蓝眼睛，不了解他的人总把他当作“外宾”和“国际友人”，而此时他总是微笑地纠正对方：“不，我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说到此，他那带有浓重外国腔的汉语中还流露出几分自豪的神情。人们都笑了，他也笑了。

在研讨会期间，爱泼斯坦不仅在大会作了题为《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以及他们在上海同宋庆龄的关系》的发言，他还以一个当年战地记者的身份，给青年朋友讲述了自己从1933年到1944年在中国抗战前线采访的经历：1933年冬，《京津泰晤士报》老总把一本书交给爱泼斯坦，让他写一篇评论。这本书便是埃德加·斯诺的《远东战线》。当时斯诺是燕京大学教授、著名记者。爱泼斯坦被该书打动，专程前往北京拜访斯诺，两人由此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并经常利用周末时



作者与爱泼斯坦在上海

间聚会聊天。嗣后，又通过斯诺，爱泼斯坦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等进步人士结识，加入了这些国际友人的行列。与斯诺的交往，影响了爱泼斯坦的人生道路。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驻华记者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采访。在采访抗日救亡活动时，他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抗日的悲壮深深地震撼了爱泼斯坦。不久，“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爱泼斯坦的父母移居美国，但是爱泼斯坦却留在了战火愈演愈烈的中国。在

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成了爱泼斯坦报道写作唯一主题。1938年4月，他又奔赴台儿庄战役前线。1939年，他在伦敦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人民之战》，向国外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坚决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事迹。爱泼斯坦还与斯诺一起帮助转移敌占区的爱国者、革命者到根据地去。1937年5月，邓颖超到北京治疗肺结核。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斯诺亲自护送她到天津，找到爱泼斯坦协助返回西安。1938年，爱泼斯坦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宋庆龄。不久，宋庆龄邀请他参加致力于战时医疗救济和国际传播工作的保卫中国同盟。爱泼斯坦负责编辑出版英文半月刊《新闻通讯》，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真实情况。1944年5月，中外记者团突破国民党封锁访问陕北，爱泼斯坦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

1987年3月，爱泼斯坦和夫人黄浣碧（左1）应邀在上海演讲时，与邓裕志（中）、孟波（右2）及作者合影。



来等领导人，在国外重要报刊上发表十几篇通讯，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战。

年已72岁的爱泼斯坦记忆力非常好，在演讲中，他说：“还是1938年在刚收复的台儿庄，我在笔记中记道：机关枪将发了芽的柳树拦腰斩断。发臭的尸体。士兵修复被打穿的房屋。被打中的日本坦克一动不动。城墙内侧是蜂窝状的防空洞。村里只有两个老乡在整个战斗中沒有离开，其中一个年为80岁。如今逃难的人都回来了。你是住在这儿吗？我问一个人说：当然啦！那是我的家嘛！他指着一堆废墟说。”

爱泼斯坦这篇以《全民抗战和抗战精神》为题的演讲非常成功，深深感染并教育了在座的青年，赢得全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会后，我握着他的手，感谢他为上海的青年学子做了如此生动而

富有历史意义的演说。

我先前曾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阅览室看过一份史料，是刊登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中国抗战画史》上的一幅照片，这是爱泼斯坦在台儿庄大捷后的留影，1938年4月，爱泼斯坦第一次亲临战

场，他目睹了中国官兵冒着日军猛烈的炮火，前仆后继地打垮日军进攻。他非常振奋地向世界报道了台儿庄大捷。图片说明写道：“满负战利品作投降状之外国记者爱泼斯坦”。于是，我玩笑地对他说：“您还记得当年那个十分滑稽的样子吗？”他听后，立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记得，当然记得。喔，是在草房前的一个石磨旁边，我头戴钢盔，装扮成这个样子的！”他举起了双手，令人发噱地模仿当年鬼子投降的形状，“那个时候真正是太高兴了！中国人民胜利了！”他说。

乘着会议的间隙，爱泼斯坦提出建议，请我是否可以陪伴他到摩西会堂旧址去参观，我欣然应允。因我约略知悉，二战期间，曾有两万余名犹太难民居住在虹口地区的长阳路、霍山路、高阳路等地方，摩西会堂成了难民经常聚会的场所，支持着他们的信念，使他们在新环境中迅速振兴。他们开设学校、医院、商店、工厂等，继续播种着生活的希望，并通过各种有组织的活动坚持反法西斯斗争。上海成了他们在远东最温暖、最安全的避风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战争结束后还逗留了许多年。

我俩在一家茶馆的临窗位置落座，午后的阳光从窗外斜斜地射在桌上，我们一边品着咖啡，一边聊叙着。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告诉我，他的名字实际叫伊斯雷尔（Israel），亦谓“以色列”，而他的姓爱泼斯坦（Epstein），则为犹太民族中的一个大家姓。1915年4月20日，爱泼



满负战利品作投降状之外国记者爱泼斯坦

爱泼斯坦出生在波兰。1917年，年仅两岁的爱泼斯坦在父母怀抱里从日本来到了中国哈尔滨，不久去天津。长大后，爱泼斯坦进入英美传教士在天津办的学校读书。当时，天津是洋人控制的通商口岸，五分之四的地盘是外国租界，五分之一的空间里居住着中国人，这条街被外国人称为“唐人街”。

“我不喜欢民族压迫和歧视。”爱泼斯坦回忆说：“我的父母从来教育我反对歧视，不管这种歧视是针对我们，还是任何别人。”这种“众生平等”的启蒙，使爱泼斯坦始终以同情的眼光看待他生活的这个国度和这个国度的人民，也使爱泼斯坦最终投身到这个国家人民革命的洪流之中。

经过片刻的沉默，我说道：“听闻您的姑姑在二战中被德国纳粹杀害了，这种悲苦的经历似乎更加强了您的族群情结。”他顿了一下，继而说：“我的家世大致是这样的：

祖父戴维·爱泼斯坦原来是犹太圣经教会的一名神学生，但后来却成了立陶宛（当时由沙皇俄国统治）维尔纽斯火车站的一个运输代理商。他娶了哈耶—克雷娜·贝弗，她的家庭从事出版希伯来文祷告书和《犹太圣法经传》（它们在许多国家被广泛应用）。他把这些书籍运往世界各地，扩大了自己的接触面和知识面。从各地的来信中，他也了解一些海外的事情。因此，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成为一个犹太居民区教会的长老。象征这一地位的是他在公众聚会中所戴的一顶丝织大礼帽。他个子小，所以这顶帽子戴在头上特别显眼。”

“我的父亲拉扎尔和他的妹妹丽贝卡，在脑力上显然是最出众的，并成长为反对沙皇统治的革命者。他们的组织是犹太劳动同盟。”

“由于他的一位老师的引导，父亲大约从12岁起就为他的党服务。像他这样小个子、又驼背，别人是不大会怀疑他秘密传递革命情报的，而他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姑姑丽贝卡又能干、又热心，一辈子都是积极分子。她成为工会干部，一度在巴黎大学接受培训。”

“她最终被德国纳粹杀害。据说，即使在列队走向可怕的死亡时，在一种旨在彻底剥夺一切人类尊严的环境中，她仍然尽量伸直佝偻的背部站立着并且还帮助他人。沙皇的宪兵常常来搜查我家，以便找到可用以迫害我父亲和姑姑的证据。遇到这种时候，祖母总是显示出她的无畏精神。她会不失时机地把那些可能被用作罪证的文件藏到他们

找不到的地方。如果她的孩子们被捕了，她就带着一篮子食物，昂首挺胸地送到监狱里去。”

“在犹太劳动同盟的组织中，我父亲是母亲的上级。我父亲虽比母亲只大五岁，但比她经历过更多锻炼。他已经过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1905年革命的考验，他被捕过（前后共被捕五次），并曾作为犹太劳动同盟代表秘密前往伦敦。”

“中国的现实开始冲击我，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目睹的事实中。在我10岁之前，中国连年内战和饥饿，我看到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难民涌进天津。有的流着眼泪讨一口饭吃，有的出卖亲生孩子，因为给人家当奴婢总比活活饿死强。有一个寒冬的早晨，我在上学的路上，在一家门洞里看到一个同我差不多年纪（12岁）的孩子的尸体，他蜷缩着，已经冻僵。”

“这样，在我年幼的心灵中，中国的和世界的事态一点一点地相互联系起来。我在学习选择自己的立场，并且使自己不论遇到什么挫折都要保持自信。”

这初次的相聚，我们把袂倾心

1919年，幼年爱泼斯坦与母亲索妮娅在哈尔滨。



而谈，仿佛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彼此一见如故。

“宋庆龄是我一生最真挚的朋友”

打那以后，我们两人接触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或是在沪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互相交流，或是邀请他为上海青年作演讲，或是来沪参观新开馆的犹太难民纪念馆，或是我专程到他府上拜访做客等等。

1992年12月，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暨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要联合举办一次《史沫特莱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我是此次活动的筹备处负责人之一，在邀请名单中，我首先想到了爱泼斯坦，他欣然应允出席，并在回复中说：“我曾经在上一次（即1987年3月在沪举行的“三S及其

他国际友人在上海”学术研讨会）会上，讲了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以及他们在上海同宋庆龄的联系，而这次，除了要讲史沫特莱，我则专门侧重讲述我与宋庆龄的友谊。”

我很高兴他所选择的这个主题，因为就个人而言，这样的选题颇为难得。在宋庆龄壮丽的一生中，结识过许多中外友人，而其中最亲密的挚友，又十分特殊的同志，就是被宋庆龄称为“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的则是爱泼斯坦”。正如她于1978年5月25日致爱泼斯坦的函中，有这样一段评价：“您作了真诚的，竭尽一切的努力，您的大笔为我们赢得了对我们的工作以及对人民事业的援助和理解。”

爱泼斯坦回忆他与宋庆龄的友谊，他的叙述采用“倒叙法”——

1951年的初夏，他收到宋庆龄的邀请，乘船横渡大西洋，奔赴他梦牵魂系的新中国。

他说，这是一次艰难漫长的旅程，夫妇俩乘坐的是一艘又老又旧的丹麦客轮，它在二次大战前曾航行于中国近海，由新中国和新波兰的一家合资运输公司买下来，命名为“人民友谊号”。沿途西方国家控制的港口拒绝为这艘社会主义国家的轮船提供燃料、淡水和食品，客轮不得不行驶了一条曲折的航线，总共航行了49天，才抵达天津。途中，船员和旅客们同舟共济，互相帮助，节省食物。没有淡水，就支起帆布槽接储稀少的雨水饮用。旅途最后几天，客轮驶在距离正激战中的朝鲜半岛不远的海域，美国的作战飞机，经常呼啸着低飞掠过客轮上空，侦察、拍照，恐吓船上的人们。当他们夫妇俩由天津乘火车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时，前来迎接的人递给爱泼斯坦一张名片，上面是宋庆龄那熟悉的、苍劲有力的笔迹：“欢迎回家！”看到了这行字，爱泼斯坦夫妇流下了热泪。

在四十多年的风雨岁月中，是他成为宋庆龄开展对外传播和架设中外友谊桥梁的得力助手，是他成为宋庆龄唯一选择的传记作者。据不完全统计，宋庆龄生前给友人的800多封信件中，写给爱泼斯坦的就有200多封，足以证明其友谊之深厚。中国福利会出版社要编辑出版《宋庆龄与爱泼斯坦往来书信选》，挑选了其中的28封，须皆有中英文对照。宋庆龄的书信绝大部分是她用英文写的，而且都是手

1938年，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在香港合影。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克拉克、法朗斯、廖承志。



迹，其中还有不少当时的背景和只有收信人才心知其意的情节和缩写。每当编辑遇到这些不解的困难，便去请教爱老。他总是十分认真和耐心地加以辨认和注解，在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情况下，他宁愿打个问号，也不轻易猜译。

宋庆龄生前，有许多人要为她写传记，她都拒绝了，她晚年经过再三考虑，最后选请爱泼斯坦为她作传。这不仅是对爱泼斯坦充分的信任，也是对他实事求是的文风的肯定，更是对他把握时局脉搏能力的推崇。爱泼斯坦离休后，过着十分充实的晚年生活。这位闲不住的老人，除了必要的社会活动——如政协的参政议政活动，各种有关孙中山、宋庆龄及国际友人交往的研讨会等，他希望尽量减少一般的社交应酬活动，给他留下潜心写作的充裕时间。有一段时间，他干脆离家出走，躲到宋庆龄故居，找个安静的房屋赶写宋庆龄传记。其间，他生病住院，吩咐老伴把电脑搬进病房，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就自己在电脑上写作，爱泼斯坦并没有辜负宋庆龄的期望，同时也深知责任之重大。他以七十高龄的惊人毅力，整整用了十年的时间，勤奋笔耕，终于完成了宋庆龄生前的嘱托，在1992年出版了宋庆龄传记《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这本传记，他严肃而认真地研究和考证每一个史实。它既是宋庆龄永垂史册的一本传记，也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一部侧记。

“我所收藏的无价之宝”

在我与爱泼斯坦在18年的交往中，最难忘的一次是2001年6月19日，我接受他的盛情邀请，到他府上做客的情形。

那一次，我赴北京参加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暨第二届理事会活动，会议的末了，爱泼斯坦对我说：“陈先生，你若有闲暇，晚上可以到我家中去喝茶吗？”能有机缘去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友府上去做客，真是我多年求之不得的愿望，我当即颌首应允。

我驱车来到北京友谊宾馆，并向门卫人员通报了爱泼斯坦62932的楼区号码。暮色中，我远远地看到一位长者立在公寓的大门前等候着，不用猜，那就是爱泼斯坦。他很客气地握着我的手，把我迎进屋子，而他的夫人黄浣碧则忙碌着给我沏茶。客厅墙上高悬的一幅毛泽东主席的画像格外引人注目，画像是石印版的，镜框陈旧，纸已变黄。“这是我一生最可珍贵的无价之宝，这是毛主席在延安赠送给我的。”说到此，他的镜片后的双眸变得异常柔和。我仰起头来，看到这帧画像上，毛主席用炭笔题写的“毛泽东”三个遒劲的大字仍然十分清晰。虽然时隔半个世纪，画像依旧被保存得很好，更难能可贵的是，这幅画像曾随爱老带到美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反共猖獗时期，仍完好无损。

这幅画像将爱泼斯坦的思绪带回到几十年前的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

他深情地回忆说：“我在十岁左右时因受家庭的影响，对二十年代的中国大革命就有好感，以后又



爱泼斯坦珍藏的毛泽东画像

知道有中国共产党，也知道了长征。

“我曾在南京结识了八路军代表叶剑英、博古（秦邦宪），在武汉结识了周恩来等同志。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但他们却朝气蓬勃。虽经历长时期的内战，受了那么多的磨难，他们对自己从事革命仍充满信心……”

爱老侃侃而谈，作为认识中国革命半个多世纪的老人，他对那段历史如数家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人饱含深情。爱老接着又讲到1938年结识了宋庆龄，从此在她的领导下从事支援抗战和人民革命事业的经历，随后又谈到1944年他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和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情景。

书房里有一幅长长的照片：“延安人召开大会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开辟了第二战场——西欧对希特勒的大反攻”，人头攒动，蔚为壮观。爱泼斯坦站在日共领导野坂参三和马海德的中间，同边区人民一起享

受胜利的喜悦。

爱老又从书房的抽屉取出几本黑色胶皮面的采访本，纸都发黄变旧了，上面密密麻麻清秀纤细的英文小字清晰可见。当年，年仅二十九岁的爱泼斯坦在延安曾访问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贺龙、邓发、徐特立、陈毅、聂荣臻、王震、谭政、罗贵波、林枫等人。

照片和采访本使他的思绪又回到当年。“记者团中不管同情或不同情中国共产党的，都看出延安和重庆气氛不一样，知道中国的未来在这个地方。我从延安看到了中国，深信一个新中国就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诞生。这个想法我去延安之前就有了，延安之行，使我更坚信这点。”

爱泼斯坦说到此，停顿了一会儿，继之，他又引领我在长方形的大客厅里参观，这儿有他多年收藏的一些中国瓷器等工艺品和友人赠

送的字画，洋溢着主人对中国文化的爱好。客厅中那沿墙而立的高大书架格外引人注目，在书架的各层都摆满了中外图书，从英文版的《资本论》，到他参与定稿的英文版《毛泽东选集》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方面的中外著作。当然还有他自己历年出版的著作《人民之战》、《未完成的革命》、《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等，真是琳琅满目。客厅的东侧有间不大的书房，也是他的工作室。这里设有几个资料柜，收集有他写作需要的剪报资料和一些学术研讨会材料，还有一些图片。

爱老自从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后，就“成为了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革命的那一伙外国人中的一员”。1951年，当他接受宋庆龄的邀请和夫人邱茉莉重返中国时，他的感受是：“那时候，可以说是回家了。”从那以后，爱老从未离开这个“家”，1957年，他加

入了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和中国人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同甘苦、共命运。

改革开放时期，爱泼斯坦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积极参加参政议政活动。他离休后还从事不少社会活动。他一直是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的领导，同时还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福利会和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继续担任《今日中国》的名誉总编辑。

谈起家庭生活，我知道他对夫人邱茉莉的感情最深沉。她出生于英国的劳动家庭，他们1939年在香港支持中国抗战的活动中初识，后均被关进日本拘留营，又共同逃脱魔掌到了重庆。邱比他大几岁，身材高大，为人热情厚道，他为这英国姑娘所倾倒。不久，这对异国青年心心相印，结成终身伴侣。1951年一起回到中国共同参与筹办对外刊物，在杂志社都作为专家负责英文编务。他们在北京安家，收养了两个中国孩子，组成温馨的家庭。在“文革”动乱中，爱泼斯坦夫妇均遭冤狱，他们最挂念的是这两个孩子。还好，托保姆李妈照顾了孩子的生活。直到1973年春，一家人才得以重逢团圆。1984年家庭出现不幸，邱茉莉病故。爱妻故去给爱泼斯坦带来巨大的悲痛。他在回忆录中曾这样深情地怀念她：

为了中国人民
历经四十个春秋
你献出了你的全部心血
现在你自己在向死神抗争
中国儿女的鲜血
不断地流进

1944年，毛泽东（后排右1）在延安接见外国记者，前排右2为爱泼斯坦。



你的血管
在你体内
东方和西方的精华
汇聚成一道长河

年迈体衰的爱泼斯坦孤身一人，生活寂寞。一些好朋友很关心他的晚年生活，希望为他物色一位新伴侣，好相互照应生活。如此，黄浣碧女士走进了爱泼斯坦的生活，成为他的贤内助。她退休后，主持家务，生活上多方细心呵护老人，而且成了他的秘书：对外联络，陪护外出参加社会活动。在他生病住院期间，精心护理在病榻前，还不时回家做些可口的饭菜送到医院。爱泼斯坦几次得以康复，新夫人的操劳功不可没。爱泼斯坦晚年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新居平时是清静的，除了看书写作，天气好，老伴就用轮椅推着他到楼后的河畔漫步，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到周末，在京的儿女则带了小孩子回来看望老人，老两口享受天伦之乐。

临别时，他牵着我的手，和夫人一起，一直将我送出门外，彼此紧紧握别，等到车开得很远了，我依依不舍地回过头去，看到他和夫人还站在门口，暮色已经降临。

桑榆晚景亦灿烂

就在我辞别爱泼斯坦的第二年，也即 2002 年，由于年事已高，他在医院做了结肠癌手术，打那以后，老人的身体大不如前，但是他并没因此消沉，而是对生活始终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2004 年，89 岁高龄的爱泼斯坦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见证中

国——爱泼斯坦回忆录》。这部长达三十余万字、覆盖近百年历史的回忆录的中文译本，出自三位资深翻译家沈苏儒、贾宗谊、钱雨润笔下，由面向全球的新世界出版社出版。《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最后一章《夕阳之歌》里，他这样写道：“我的回忆录在这里就结束了——就目前而言。在以后的十年里——如果我能活这么长的话——我也许会写一段‘尾声’。如果活不到这么长，那我的这一工作就算完成了。”“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每当读到这段话，我在心里总会默默地在说：“亲爱的老友，虽然不过百年，但是，您却用这有限的生命谱写了人生辉煌的乐章。对于您，桑榆晚景亦灿烂！”

2005 年 4 月 25 日，是爱泼斯坦的九十华诞，我从上海给他打电报表示热烈祝贺。谁又曾料想，仅仅隔了一个月，即 5 月 26 日，

他竟永远地离我们而去。我得知消息，以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的名义，向爱泼斯坦夫人发去了唁电，对爱泼斯坦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2013 年 1 月 17 日，爱泼斯坦遗孀黄浣碧女士应宋庆龄基金会邀请，来沪出席《宋庆龄与爱泼斯坦往来书信选》出版发布会，下榻于徐家汇青松城大酒店。其时，她打电话到我家中，想彼此见上一面，以便赠送一本新出版的书籍。遗憾者，我当时人在外地出差，无缘悭一面。黄浣碧女士即托请宋庆龄基金会工作人员将签名本转交于我，此本由中国福利会出版社于 2012 年 1 月出版发行的《书信选》，至今仍放在我书柜最醒目的地方，弥足珍贵。

完稿于 2015 年 4 月 20 日 爱泼斯坦诞辰 100 周年。

作者系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爱泼斯坦一家于 1997 年



忆金宗蔚

顾子欣

就在前两天，7月2日的傍晚，张可久同志给我打电话来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老金，金宗蔚同志去世了，是6月29日凌晨走的。”我听了甚感震惊，问道：“他是怎么走的？不到一个月之前，他还给我打过电话呢。”

张可久回答说：“老金患的是无症状心梗，事先并无明显不适；也可以说是老年性的心力衰竭吧。他已届89岁高龄，走得很安详，没有多少痛苦，称得上是无疾而终了。”

张还告诉我：“老金的后事办得简之又简。今天去向他遗体告别的总共只6人：老金的女儿等亲属3人；代表友协的3人，就是王红、章丽珍和他。友协离退办原也要派人去，但老金的家属婉拒了，只答应曾与老金在《友声》杂志共事多年的他们3人去向他最后告别。老金做人一生都很低调，直到他离开人世时也是这样。但他在友协工作了一辈子，他是个实实在在的好人好同志。我们希望你能写一篇缅怀他的文章。”

我当即应承我将写这篇文章。是的，无论为老金的人品和学识，或为我们半个多世纪的同事之谊，我都应该也从内心想要写这篇文章。

回想起来已是遥远的往事了，当1962年我最初走进和大（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院子，分配在亚洲组工作，从此与老金相识成为同仁。那时他也不过30多岁



2008年，金宗蔚（中）与《友声》历任主编田惠贞（左4）、顾子欣（左2）、张可久（右1）、王红（左1）在纪念《友声》杂志创刊25周年座谈会上合影

吧，但他身材瘦瘦的，说话慢悠悠的，显得相当老成，大家已管他叫老金，我便也这样称呼他。

回想起来却又是恍如隔日的事，当他上次给我打电话，说他已收到我送他的书（《顾子欣散文选》），特表示感谢，将细细品读。我问他身体可好，他说他走路吃力了，但精神还行，眼睛没毛病，还在给《友声》看英文稿子。

回想起来，老金堪称是和大（也是友协）的一位元老。他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50年代初即调到和大工作，从此与我国的民间外交事业联系在一起，为其奉献了他毕生的才智和精力。

在建国之初，和大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外交机构，工作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接待来访外宾，派团出国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组织各类配合官方外交的民间集会和活动等。故在这里工作的外文干部，既要能当翻译，又要会起草文件，给领导人写讲话稿；还要跑里跑外的，与国内外各种人士打交道。这些工作老金也都做，但他做的最多的却是文字工作，尤其是笔译工作。做笔译工作需要下精雕细琢的功夫，需要有甘于寂寞的精神，而老金正是赋有这种功夫和精神的人。

老金语言功底深，又细心，做

笔译工作也恰能发挥他之所长。从表面上看，老金是个慢性子人，做什么事都不慌不忙，慢条斯理的；而其实他的工作效率很高，他很出活儿，活儿做得很麻利。他的中英文译文皆信实流畅。他写得一手好字，看他的手写稿令人赏心悦目。他给人改稿子，也字迹清晰工整，让人看了一目了然。这既表现出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也反映出他内在的人文素养。

从 1962 年起至 66 年“文革”开始，我与老金都是在一起办公。我视他为我的大师兄，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文革”中我们曾分别下去干校劳动。“文革”中期从干校回单位后，我仍留在亚洲组（后为亚洲处、亚洲部）工作，老金则分配去做杂志（《亚非记者》和《号召》）的翻译工作。1972 年和大与友协合并，我们又都成了友协的干部。1983 年 6 月，友协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友声》，由田惠贞同志任主编，岑昌咏、金宗蔚同志任副主编，唐建文同志任英文定稿。唐其时年事已高，老金实际上是协助唐做英文定稿工作的。

说来也真是机缘凑巧，1984 年我调任文宣部领导工作，《友声》属文宣部管，于是我又与老金等老和大的同志们在一起工作了。田惠贞同志退休后，我曾任《友声》主编数年，在工作上与老金等有了更多的接触。此时王劭伯同志也在《友声》做英文翻译和核稿工作。《友声》编辑室可谓集中了友协的外语顶尖人才。我与他们在一起工作受益良多。

在我另有任用调离《友声》后，

由张可久同志接任主编；张退休后，由王红同志任主编至今。而《友声》的英文定稿，自 2000 年唐建文同志离世后，则一直由老金担当着，直到他停止呼吸为止。从 1983 年《友声》创刊，老金作为其创始人之一算起，至今年今月他谢世而去，他为《友声》辛勤耕耘了 30 多个年头；在整个友协他是为《友声》工作时间最长的人。

在这里，在缅怀老金的同时，我不禁也想为《友声》说几句话。诞生于改革起步、国门初启之时，《友声》为各国对华友好组织、友好人士了解友协、了解中国，打开了一个窗口。30 多年来，它不断发出来自友协的声音，迄今已出版了 180 期，为友协的对外交往保存了较完整的文字资料，成为民间外交的一个缩影。《友声》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友声》是友协可引以自豪的一个品牌。

2007 年新闻出版总署曾对国内 148 种外文版学术期刊编校质量进行检查，以差错率万分之五为合格标准，结果仅 44 种期刊达标，合格率为 29.7%。而《友声》的万字差错率仅为万分之二，与《英语世界》杂志并列第六名。这无疑是对《友声》外文编校质量的一个表彰。这是王红等《友声》编辑室同志勤奋工作取得的成绩。而老金作为这杂志的英文翻译的把关人，自然更是功不可没。

老金一生淡泊名利，朴实无华；他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着默默无闻、切切实实的工作，而且尽力把它做到最佳。他使我想起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的话：“他不是

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我觉得用此话来比喻老金也是很贴切的。

虽做着看似单调枯燥的文字工作，老金却热爱生活，有多样的爱好和造诣。以他的毛笔字而论，他绝对可称之为书法家；他写的行书颇得王羲之笔墨神韵。他也喜欢摄影，擅用镜头捕捉生活中的诗情画意。他写的文章我所见不多，只是有一次友协离退办举行老同志书法摄影展，他有摄影作品参展，并附以短文说明。那说明是用古文写的，简练而富幽默。我看后对他说我很欣赏这短文，它有明人小品味。他听了笑笑说：“多谢夸奖，承蒙你好法眼。”老金其实是一个多才多艺、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人。

我与老金不但在过去曾共事多年，在我退休之后，友协返聘我任英文定稿，故我这些年也做着类似老金所做的工作，我们仍可算是在共事。友协共聘有 3 名英文定稿，即王劭伯、老金和我。王和我负责会内文件翻译；老金则专负责《友声》翻译。有时为某个翻译问题，我也会与老金联系切磋；逢年过节时会向他电话问候。我们都珍惜在长年岁月中所积累的一份情感。

老金活着时默默地干活，离世时悄悄地走去了。英国诗人华尔特·兰多（Walter Landor）在他的《终曲》（Finis）一诗中写道：

我与人无争，因无人值得我争。

……

我烤着双手，当生命之火熊熊；
当火焰将熄，我准备走上归途。

拜谒马克思故居

姜永良

说起特里尔，恐怕知道的人不多，但提起马克思，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德国特里尔市就是马克思的故乡，马克思故居就位于特里尔市吕布肯大街10号。2013年3月24日，我访问特里尔，拜谒了马克思故居。

特里尔市位于摩泽尔河畔，曾是西罗马帝国的首都，又是西方世界四大古都之一，也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公元前16年（中国西汉时期），君士坦丁大帝建立了这座城市，现在很多古迹都有古罗马的风格，大多被世界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特里尔市人口10多万人，在1600年前，人口就已达8万人。

与特里尔大学孔子学院师生座谈结束后，我们立刻赶往位于吕布肯大街10号的马克思故居。马克思故居现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心中圣地，每个来特里尔的人都会到马克思故居参观。

马克思故居是一栋灰色的三层楼房，巴洛克式风格，是德国莱茵地区的典型建筑，外墙上镶嵌着马克思头像铜雕。故居始建于1727年，

1818年，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律师租了这所房子，办公居住两用，楼上住人，楼下开律师事务所。同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在这里，一家人在这里居住了一年半时间。192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以近10万帝国马克从私人手中买下当时已经改为铁器店的马克思故居，改建成马克思恩格斯纪念馆。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将该处房子没收，文物被洗劫一空。1947年5月，马克思故居再次开放，成为特里尔市重要的文化旅游景点。现在马克思故居属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所有。

故居是回字形建筑，院内有天井，后面有花园。故居一楼有4个展室，陈列着马克思出生证、与燕妮的婚约和结婚证书、家庭照片、死亡证书，还举办各种展览；二楼有2个展室，主要展示马克思著作，其中有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目前世界仅有3本。这里还有一本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封面上有周恩来签名，时间是1934年。整个展览用现代化方式，全面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一生的主要活动、业绩，

以及盟友和对手情况。参观当中，碰到一些外国人，年轻人占相当大比例。据说，来这参观的人以中国人和中东欧人居多。

马克思17岁时离开了特里尔再也没有回去过。一楼有个小纪念品店，陈列着很多有关马克思的纪念品。有马克思著述、马克思雕塑，有印有马克思头像的T恤和杯子，还有以马克思命名的葡萄酒等。

在特里尔市市立博物馆，我们还看了一个关于马克思展览，展品全部是以马克思为题材的艺术品，有雕塑、瓷器、油画、版画、漫画等，其中一幅巨幅油画出自中国画家之手。在欧洲人眼中，马克思不是伟人，更不是神，在一些外国人写的旅游书籍中，马克思被称为经济学家，在特里尔的介绍中，称马克思是哲学家、政论家、资本主义批判者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缔造者。

离开故居，大家买了很多关于马克思的纪念品。我也买了瓶马克思牌红葡萄酒。据说，马克思生前非常喜欢这款葡萄酒，于是纪念馆就把这种酒叫做马克思葡萄酒。■

(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

I warmed my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It sinks, and I am ready to depart.)

老金的生命之火熄灭了，他已踏上了他的归途。但我们会深切地怀念他；《友声》编辑室的同志们会怀念他；友协的同志们会怀念他。

而且我相信，当《友声》的成千上万的国内外读者们，得悉他去世的消息，并了解到他们为阅读的这

份杂志所做的贡献后，也会向他寄予谢忱与哀思。

2015年7月4日

作者曾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对外文化交流部主任、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参赞等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